

「我城」之戰：文本內外的香港故事 (1974-2019)

陳大為*

〔摘要〕

本文以西西在《我城》所創造的「城籍」意識為起點，討論四十餘年來香港詩人從單純的我城敘事、對英殖民地的懷舊、回歸前後的心態轉變、到激烈的城市抵抗運動；以新詩為主，小說、散文、隨筆為輔，兼及一些社論和報導文章，以更開闊的視野去探討這座文本城市的精神內核。其中，2003年是重要的轉捩點，原本潛伏的「抵抗性認同」被一連串社會事件誘發，漸漸浮出地表，一方面增強了「我城」的歸屬感，另一方面也增強了對「其他人的祖國」的敵意。「我城」與「他國」的對奕，導致香港詩人的寫作越來越向政治詩靠攏，深陷於城市政治的戰火之中，無以自拔。

關鍵詞：香港、我城、城市、政治、街頭運動

*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教授。

前言

1938年之前的城市研究通常是分工的，文學、藝術、歷史、經濟、生態、哲學、政治、地理、文化，每個領域的學者分別用本身的研究視野和治學方法來探討都市，研究成果不算豐碩，即使有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 1850-1928）的《明日的田園城市》（*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¹ 1898），提出田園城市的擴散概念並引發了浪潮；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 1854-1932）在《進化中的城市：城市規劃與城市研究導論》（*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 1915）提出「集合城市」理念；柯比意（Le Corbusier, 1887-1965）《都市學》（*Urbanisme*, 1922）把工業化思維導入了都市計畫，並提出「城市集中主義」，但他們都偏向都市規劃，對城市的發生與演進缺乏歷時性的關照。城市史學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當屬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 1938），他將各家視野綜合起來，重新檢視一座城市及其文化之構成。這項方法學上的重大突破，大幅開拓了城市研究的範圍，也激活了一個全新學科的發展，此書很快成為歐美相關學科的指導性經典。後來，劉易斯·芒福德又有另一部劃時代的經典巨著《歷史中的城市》（*The City in History*, 1961）面世，奠定了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基石。

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裡指出，經過無數的調查研究工作證明，城市不僅僅是一個大家原本認定的——純粹的物質事實，「就其完整意義而論，城市是一個地理叢結（*geographic plexus*）、一個經濟組織、一個制度過程、一個社會行動的劇場，以及一個美學象徵的集合體。一方面，它是一個為在地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服務的物質結構；另一方面，它是一個有意識的戲劇性場景，為那更重大的行動或更崇高的文化目的而服務。城市孕育出藝術，本身即是藝術；城市創造出劇場，本身也是劇場。就在這城市裡，這作為劇場的都市裡，某些較有目的性的活動經由名人、事件、群體的衝突與合作，被制定和編製成更為重大的高潮」，²城市的身世由此而來。劉易斯·芒福德相當全面的界定了城市（及其研究）

¹ 1902年第二版面世時，更名為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² 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8), p.480. 此段引文從原文自行翻譯。

的範圍，五花八門的內容皆是構成城市的要素，藝術文化、政治事件、生態系統、社會政策、軟硬體建設，都是一座城市的零件，以致後來的城市研究或都市學越來越複雜。一旦城市詩或都市詩³進入這個廣大的領域，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就更多了。

在整個華人世界，沒有比香港更複雜的城市，尤其政治上的僵局，讓這座歷經一百五十六年殖民之後，回歸到中國統治底下的「英式城市」，不斷與中共的治港政策產生磨擦，甚至發生「反送中」的激烈的衝突。在文學領域，香港作家展現了鮮明「懷舊」（英屬歲月）和「抵抗」（中共治理）的意識，城市的前世今生成了文學創作的重大主題，二十年來歷久不衰。本文嘗試從香港詩人切入，以新詩為主，小說、散文、隨筆為輔，兼及一些社論和報導文章，以更開闊的視野去探討這座文本城市的精神內核。

³ 關於城市和都市在命名上的差異問題，參閱拙作《鬼沒之硯：當代漢語都市詩研究》中的界定，書中討論了中、英文命名上的混淆之處，最後劃分出三個規模：「城市 city」、「都市 urban」、「大都會 metropolitan」。以倫敦作為典型，其行政區劃分為倫敦城（City of London）和 32 個市區（boroughs, urban areas），城外的 12 個市區稱為內倫敦（Inner London），其餘 20 個稱為外倫敦（Outer London），構成八百多萬人口的大倫敦市（Great London），進一步擴張，則是一千三百多萬人口的倫敦都會區（London metropolitan area）。「城市」、「都市」、「大都會」在規模上的差異，正好用來重新定位「城市詩 city poetry」和「都市詩 urban poetry」。「城市詩」的寫作對象不明確、不分類型，也不分規模，屬於「普遍定義的城市詩」，可同時涵蓋城市和都市；「都市詩」專論規模較大的大都市或大都會（兩者規模與概念相近，故合為一類），是一種「以大都市／大都會為對象的詩」。描述中小型城市或市鎮的詩作，不能冠上都市詩之名，詳見陳大為：《鬼沒之硯：當代漢語都市詩研究》（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2016 年），頁 161-166。香港全境由香港島、九龍、新界，以及 263 個島嶼構成，在 1980 年代後期已經進入成熟的「香港大都會」（Hong Kong metropolitan area），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林立的摩天大樓和密集住宅、完善的地鐵和電車、繁忙的國際機場、還有輕工業區、傳統鄉鎮。單就「港島」來說，它是一個典型的現代化「都市」（urban），九龍與新界保有部分郊區，外島極大部分屬於漁村，「香港大都會」的核心和非核心地區在社會建設和生活機能的差異十分明顯，跟倫敦情況差不多。用「都市（詩）」之名來研究香港是合乎規格的。不過，本文在論述上必須重用「我城」意識，同時會觸及隱藏在社運背後的「城邦化」現象，而且大部分香港文獻都習慣用「城市」一詞，故本文主要以「城市」之名來討論香港，必要時才用上「都市」一詞（譬如「都市化」、「都市詩」、「都市文學」等慣用語）。對香港而言，兩者皆可，並不衝突。

一、因緣際會：城籍的誕生

香港的崛起跟上海有關。上海在解放後，立即由消費導向的遠東國際金融中心，轉型為生產導向的國內工業大城，一如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1901-1972）所言：「由一個為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服務的城市，變成為人民、為生產服務的城市」；⁴上海的國際金融和國際商港的地位崩解，另一主因是自 1950 年 12 月起，中共因韓戰遭到貿易禁運，上海被迫關上國際化的大門，港遂成為轉運大陸物資的首選之地，一舉取代了上海在遠東的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此外，海外華人電影藝術人才和資金的聚集，促進了香港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使之晉升為全球華語電影的生產基地，帶動整個娛樂產業的興盛。自 1974 年開始，香港進入經濟高速成長期，地鐵動工，推行九年免費教育，擴展公屋計畫，為「香港經濟奇蹟」奠定良好的基礎，更重要的是香港在地文化的建構——粵語雅化。「粵語群可說是中國最大的語言共同體之一。同時，因為方言字的創造、說唱文藝的出版和流行，粵語具備了深厚的書寫傳統，加上外來傳教士的推波助瀾，這種特殊的文化優勢，使粵人可以成為能說又能寫的『語言共同體』(Language community)，有力地支持晚清及以後的粵語寫作」。⁵換言之，香港社會原本就存在著可作為書面語的粵語寫作，長久發展下來，成為主流日常用語，既保存了一些古漢語詞彙，對英語詞彙語音上又有兼容性，⁶逐漸形成「港式中文」，鮮明的庶民色彩卻限制了它在書面運用上的廣泛性，難登大雅之堂。直到 1970 年代中期，許冠傑（1958-）⁷崛起粵語流行歌壇，開始逆轉粵語流行歌曲的地位，加上鬼才黃霑（1941-2004）典雅的填詞、編曲家顧嘉輝（1933-）創作的連續劇粵語主題曲的加溫，三個廣州出生的香港人⁸改造了粵語流行音樂，也改變了粵語在華人世界的地位。在此同時，許氏三兄弟的粵語電影⁹在東南亞華人社會打下前所未見的粵語電影版圖。進入

⁴ 轉引自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5 年），頁 22。

⁵ 李婉薇：《清末的粵語書寫（修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 年），頁 36。

⁶ 侍建國：〈港式粵語及其身份認同功能〉，《語言戰略研究》2018 年 03 期，頁 42-48。

⁷ 許冠傑出生於廣州，1950 年隨家人移民到香港，少年時期便組樂團。其後四張粵語專輯《鬼馬雙星》（1974）、《天才與白痴》（1975）、《半斤八兩》（1976）、《財神到》（1978），成就了許冠傑在 1970 年代在香港流行樂壇的統治性地位。

⁸ 黃霑和顧家輝都出生於廣州，分別在 1949 和 1948 年移民到香港。

⁹ 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三兄弟合作的電影《鬼馬雙星》（1974）、《天才與白痴》（1975）、《半

1980 年代，粵語影視產業更全面席捲東南亞及北美華人社會的流行文化，聲勢之大，遠非台灣（華語）影視業可以望背，連上海人對洋場上海的認識都得仰賴港劇《上海灘》（1980），再加上綜藝節目《歡樂今宵》（1967-1994）和流行樂壇大獎《十大勁歌金曲》（1984-），港星的形象魅力全面統治了整個海外華人社會。這一切，間接在港人心目中建立了一種「就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文化自覺」。港人已經認識到粵語的「現代創造力」和嶺南文化的「傳統魅力」，兩者在 1980 年代的跨國文化傳播過程中混合出新的元素，「香港製造」躍升為華人世界的重要文化品牌，一個充滿文化自信的粵語社會也順勢降臨在這彈丸之地。

香港的文化自信和防衛機制是共生的，一如《上海灘》所代表的影視榮光，跟《省港旗兵》（1984）所突顯的危機意識。這部電影講述一票由廣州偷渡來港犯罪的退伍軍人，這些手段凶狠的「大圈仔」又被稱作「省港旗兵」，他們嚴重威脅了香港的治安。港人口中的大圈仔、蝗蟲、大陸喱、阿燦，都是對大陸偷渡客的稱呼，這些都帶有明顯的侮辱成份的流行語，顯示出香港社會對大陸（人民）的普遍性歧視心理。一種強烈的防衛機制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漫延開來。

這份充滿敵意和不安感的防衛機制，跟中英談判脫不了關係。

全港人民都曉得中英兩國對香港回歸問題一直存有歧見。在稍早的 1979 年 3 月，港督首度訪問中國，向鄧小平（1904-1997）提出香港前途問題，這一問，點燃了港人對殖民地前景的深層憂慮，「九七問題」開始萌芽。¹⁰1982 年 9 月 24 日，

斤八兩》（1976）、《賣身契》（1978）、《摩登保鏢》（1981）等，曾經五度拿下年度票房冠軍，三度改寫香港開埠紀錄。詳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許冠傑>〉，檢索：2020 年 5 月 31 日。

¹⁰ 從 1980 年開始眾多報刊雜誌推出九七問題的專題稿或社論，包括黃楊烈：〈香港——一九九七年？〉，《明報月刊》第 15 卷第 2 期（總 170 期）（1980 年 2 月），頁 69-78；黃錦明：〈一九九七你能走得了嗎？——香港人移民外國前景分析〉，《百姓》創刊號（1981 年 6 月），頁 11-13；勞思光：〈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問題〉，《七十年代》總第 140 期（1981 年 9 月），頁 20-24；〈怯於一九九七問題，有人自香港撤資——工商界亟盼中國宣布決定〉，《Hong Kong Industrial News》1982 年 8 月，頁 3；甄美玲：〈九七前途·人心動盪；首相訪華·形勢急轉〉，《七十年代》總第 156 期（1983 年 1 月），頁 8-9。這些文章可以讀出暗中騷動的移民潮和撤資潮。1984 年，資深媒體人雷健甚至提出「買島建港論」，他在中英文版的《找尋一個新地方：建設一個新香港》，主張用香港的外匯存底買下英國託管的小島，重建香港。詳見《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https://medium.com/recall-hk/f-5e197bfb81e7>〉，檢索：2019 年 3 月 10 日。

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H. Thatcher, 1925-2013) 親赴北京，結果人心惶惶的香港隨英相摔了一跤，也開啟了兩波移民潮。¹¹當年香港（港島）經由滿清的一紙亡國之約割讓給英國，從未正式受到國、共兩黨的統治，直接成為英殖民地，是一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¹²歷經多次的移民／難民潮，最後成了香港旅美學界周蕾（1957-）筆下的「經典的移民城市」。¹³周蕾在香港長大，親身見識過香港受到越戰難民潮的波及，以及文革期間每天傳來的動盪新聞（包括自珠江漂來被五花大綁的水流屍），還有港人對內地鄉親的各種救濟手法。周蕾在《寫在家國之外》（1995）為其成長記憶留下這段文字：

我從這些記憶中保存下來的不是一種個人或集體受難經驗的歷史，而是一種香港特有的，漂泊離散的迫切感。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香港始終夾在兩大文化之間；不論是英國殖民文化與中國共產主義文化，都不會真正關心香港的民生大計，只會把香港當作獲取他們所需的經濟和其他形式援助之地。這種非香港人自選，而是被歷史所建構的邊緣化位置 (*marginalized position*)，帶來了一種特別的觀察能力，而且使人不願意把壓迫經驗美化。¹⁴

在美國任教的周蕾代表了香港回歸前夕一種來自學界的異音，她道出了香港的處境，兩個政權對香港的治理各有盤算，清醒的港人不會美化這一切。最大的壓力來自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普遍上是窮困的，未能展現對高度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治理能力，回歸到祖國懷抱恐怕會拖累香港的經濟表現；再加上心頭的文革陰影未除，港人雖不認同英殖民政權，卻又希望借英國之手延長現狀，讓

¹¹ 第一波移民潮為 1981-1986 年，此 6 年每年移出人口約 2 萬人，1987 年劇增到 3 萬人，1990 年暴增至 6 萬，連續 5 年，這一波大潮之後逐年減緩，自 2000 年以後每年僅移出 1 萬人。詳見《香港的發展（1967-2007）——統計圖表集·表 1.12 移居外地的人數》（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07 年），頁 21。

¹² 這說法來自 Richard Hugh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¹³ 此話原出 Lynn Pan (潘林恩),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90. p.363。

¹⁴ 周蕾著，米家路譯：〈寫在家國之外〉，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1995 年），頁 30。

馬照跑舞照跳。

大英帝國首相那一跤，跌碎了港人的春秋大夢。

過沒幾天，西西（1938-）在10月出刊的《素葉文學》第13期發表了短篇小說〈肥土鎮的故事〉（1982），她用寓言口吻追溯了港島的三種來歷，無論是現實中暴起暴落的肥土鎮、傳說中從天而降的飛土鎮，或是由沉睡的巨大龜背形成的浮土鎮。這三種既荒謬卻富有暗示性的傳說，都在指涉香港作為一個缺乏堅實工業基礎，高度仰賴輕工業和國際金融業的新興都市，隱藏著令人擔憂的不穩定性，儼然就如小說裡描述的那座暴起暴落、如夢幻泡影的肥土鎮。〈肥土鎮的故事〉是華文世界最早的一篇「嚴格意義上」¹⁵的魔幻寫實主義小說，¹⁶西西將荒謬、神奇、詭譎的幻想與現實情境相融為一，香港的身世十分貼切地置入她獨一無二的「頑童體」魔幻氛圍當中，調製成一則兼具神話與童話特質的「香港寓言／預言」。

西西出生於上海，1950年來港定居，她是溫和派，肥土鎮蘊含了她（以及她所了解的一般港人）對香港未來前景的憂患，她進一步把港島孤立起來，以突顯港人本身的短視、投機、功利的文化性格，很多人擔憂這座奇蹟般崛起的繁華浮島（國際大都市），隨時會打回原貌——開埠時的寥落漁村。再多的文化自覺或防衛機制也沒用，香港終究是無助的，它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或城邦，僅僅是一座殖民地城市。關於這一點，得上溯到西西的長篇小說《我城》（1979），此書很適合用來定位港人的國族意識。

「我城」概念，處理的是日常生活裡的港人和他們生活的城市，生活乃存在的根本，是「小我」對「城市」的認同與歸屬，沒有其他外在的宏大議題。在「九七回歸」的問題浮上檯面之前，香港即是一座單純生活的「我城」——「我的城市」。出生於上海，1950年（十二歲）來港定居的西西，跟大多數香港人一樣，每回赴國外旅行都得面對——既非英國公民，又非中國公民，只屬香港永久居

¹⁵ 嚴格意義的意思，是不包括其他華文小說家表現得較生澀的魔幻習作。

¹⁶ 1982年10月，正巧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也在此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孤寂》（1967）一夕暴紅，西西隨即在11月出刊的《素葉文學》第14、15期合刊號，發表了七篇有關馬奎斯的小說介紹，可見她對馬奎斯的熟悉程度。〈肥土鎮的故事〉或可視為西西以先見之慧眼對《百年孤寂》致敬之作，但精神內核是港式的，別具深意。由於時間上的巧合，肥土鎮的詮釋路徑極可能受到馬康多鎮（Macondo）的牽引，讀者關注的焦點往往在此，而忘了當時深受中英談判所影響的社會氛圍。

民——身份窘境，港府「就權宜發出這麼一張文件。我就拿著這張文件，去過許多地方。原來我是個只有城籍，沒有國籍的人」。¹⁷城籍是尷尬，也是一份感性的歸屬。「四十年代從中國南遷到香港的人，他或許會用『旅港僑居』來形容自身，一個暫時不知道歸期的過客；數十年後，新的一代生於斯長於斯，經歷了六十年代一段社會動亂的插曲後，響起了經濟起飛的主旋律，跌倒後爬起，人們對於這方土地已有了難以割捨的情感；七十年代開始，你問他國籍，他會說，香港人」，¹⁸其實他們根本沒有其他選擇，當時中英雙方都拒絕賦予國籍身份，浮木般的城籍意識自然萌生。由此可見，「我城」一詞，意味著港人（甚少是部分香港文人）對腳下生活的所在地，開始產生了踏踏實實的歸屬感。

在出版後的四十年來，「我城」一詞在香港文學創作、評論、活動中被各界大量援引和借用，尤其在近十餘年，最顯著的是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i-city Festival 2005」（包含動畫*i-city*，潘國靈和謝曉虹兩個不同版本的中篇小說〈我城 05〉）。其後，又有各類型的文章和活動：可洛《鯨魚之城》（2009）、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2009）、金惠俊〈菲傭，被消失在「我城」的人〉（2011）、陳國球〈我看陳滅的「我城景物略」〉（2013）、MASTA·RHYME的饒舌歌曲〈我城〉（2014）、《字花》的徵文比賽「我城，璀璨的背後……」（2015）、蔡益懷〈小說我城·魅影處處——香港小說二十年（1997-2017）批與評〉（2017）、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二千年代的香港文學》（2019）。

《我城》的接受史誠如專研西西小說的學者陳潔儀所言：「從本土認同的方向一路而下，《我城》不單是香港文學的『經典』，更進一步成為香港故事的『典故』（allusion），差可挪用拉丁美洲『立根小說』（foundational fiction）的概念，成為香港文學之中建立香港人共同身份想像的堅實『地基』」；¹⁹曾經多次參加香

¹⁷ 西西：〈寫作在香港這樣的地方——2019年紐曼華語文學獎獲獎謝辭〉，《聯合報》副刊，2019年3月23日。西西在文章裡透露後來比較少寫詩的原因：「然後1997臨近，身份問題於是成為一大衝擊。這問題至今仍然衝擊著許多年輕人，這問題不要以為管治轉變了，就能輕易解決；必須用耐心、用同理心去應對。我曾經嘗試用各種小說的形式表達我的思考。我以為小說也許更能表現當下複雜的處境，也多些發表空間，多些讀者；有好些日子，我比較少寫詩了。」

¹⁸ Regina：〈凝視香港 | 照看《我城》：西西筆下的香港〉，《BIOS monthly》2013年7月5日，〈http://www.biosmonthly.com/issue_topic/3377〉，檢索：2019年3月10日。

¹⁹ 陳潔儀：〈1970年代：西西《我城》與現代性〉，《香港小說與個人記憶》（香港：天地，2010

港街頭抗爭運動的詩人廖偉棠，進一步擴大「我城」的詮釋：「香港，是經由西西和她一代的理想主義者命名為『我城』的，而他們的後後一代的年輕行動者，以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確證了這一命名，現在，我城早已不止是一本小說的名字，而是一種信念」，²⁰這個「信念說」，很能夠點出當前年輕人的心態，他們的所有行動只為了一個目的：守護香港價值。沒有退路，這是「我」唯一的「城」。兼具詩人和學者身份的陳智德（筆名陳滅，1969-）亦曾指出：「《我城》以『城籍』和『天佑我城』響應了七〇年代本土化和身份認同的尋索和反思，……消弭了狹義的本土意識的自我膨脹」，²¹他認為「《我城》有一種達觀、向上的氣氛，這倒不是因為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等官方說法，而是由七十年代青年對文化藝術和社會改革的信念建築而成。《我城》以民間自發的本土身份認同，填補了『國籍』的虛無和官方認同的虛妄」。²²陳智德強調的是向下紮根的城籍，而非虛幻無邊的國籍。

城籍，是多義性的。

當初陳智德也沒料到，《我城》將成為一個叫「我城」的符號，經由不同世代的港人之手，輾轉孕育出新的政治涵義。

山東大學黃萬華教授在《百年香港文學史》（2017）中沒有碰觸已經成形的城籍，當時談城籍免不了要踏入國族議題的紅色疆界，有點敏感，他換個角度來談：「西西從都市角度為香港立傳的書寫，也有著她對香港本土意識的充分感悟，香港自身身份意識的覺醒，並未太多地指向國族層面，而是對其城市歷史的尋找」。²³即便拐了個彎，「我城」對香港文學或市民的城市意識來說，影響依舊十分深遠。

年），第三章，頁 62-63。

²⁰ 廖偉棠：〈發現另一個地球·訪西西〉，《浮城述夢人·香港作家訪談錄》（香港：三聯，2012年），頁 32。

²¹ 陳智德：〈解體我垮城——從《我城》到《白髮阿娥及其他》〉，《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九龍：花千樹，2009年），頁 159。同見陳智德：〈本土的自創與解體〉，《根著我城》（臺北：聯經，2019年），第十三章，頁 375。

²²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頁 159-160。同見陳智德：《根著我城》，頁 375。這裡所言經濟起飛，應該是指港府財務轉虧為盈，以此作為政績在宣傳；事實上，1972-75年的香港嚴重衰退，1975年上半年的失業率最為嚴重。詳見劉蜀永編：《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2004年），頁 250-252。

²³ 黃萬華：《百年香港文學史》（廣州：花城，2017年），頁 107。

回歸二十年，在這座移民之城，港人優先認同的是「我城／香港」，其次才是祖國。

在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心裡，未必有這個祖國。

二、追源溯本：我城和它的身世

《我城》一書寫於 1974 年，隔年一月開始於《快報》連載了五個月。在小說世界創建了前無古人的城籍之後，西西的詩歌世界沒有隨之變得更複雜，反而寫了一首充滿西西體生活趣味的〈長著鬍子的門神〉（1976），表面上讀來沒什麼，就像是某人要出遠門前對家人的叮囑，詩的前三段是這樣寫的：

我該起程了
窗子都已經關上
爐子已經熄了火
我告訴過報攤依舊要每日送報紙來
米和石油氣也會按時送來

這些我都記得的
讓我再背一次給你聽
我的身份證明書是在我右邊的口袋裡
我的牛痘證是在我右邊的口袋裡
我的身份證也是在我右邊的口袋裡
我的行李不會超過四十四磅重

冰箱裡還有一個檸檬
若是你又傷風了切兩片檸檬煮一杯可樂喝喝
就像平日那樣
傷風的時候不要吃凍梨子
記得早眠早起
攝氏五度的早晨
先圍一條圍巾才好開門出外

圍巾就在木櫥的第三格抽屜裡面

一拉開抽屜你就看得見²⁴

西西有意把臨行前的叮囑寫得很囉唆，因為這會是一趟很久的遠行（所以才叮嚀商家「米和石油氣也會按時送來」，而且帶上牛痘證），²⁵鉅細靡遺的家常瑣事，即是一長串的牽掛，既放心不下獨自留守家園的家人，又怕家人放心不下即將獨自遠行的自己，這口吻，讀來很溫暖。重點是：這唯一的家人是門神。嘮叨的瑣事因此轉化成極富趣味性的掛念和對白，門神不得隨行，西西所準備的每一件事變得特別有意思，吃飯睡覺和傷風等人間生活瑣事都顧上了。也許有人會問：真實的家人又在哪裡？跑在整個華人世界之前，香港在 1970 年代率先進入都市化階段，加上早期移民社會的因素，遂產生了大量單身和頂客族（dinky），佔 1976 年全港戶數的 75%。²⁶臨行前對門神（而非家人）交待一間（即將閒置的）家中大小事，這行為背後隱藏著一種被美化的孤獨，有些許的心酸，屬於香港高速都市化所產生的一種很普遍的結構性現象，換作其他詩人可能寫得很心酸，西西卻用童稚之心把它包裝起來。這包裝很巧妙，可以將整首詩安頓在都市敘事的詮釋架構中，輕鬆，又不失其嚴謹性。

西西的專業讀者，必有不同的想法。就其同時期的詩風，及後來的創作個性來研判，西西並非有意借此策略來批判或披露新時代的家庭結構，以她的性情，最大的可能是——真把門神當作家人或生活夥伴，那是一種西西式的生活樂趣（一如她在散文集《縫熊志》裡的展現的生活細節，她總是帶著一隻親手縫製的「黃飛熊」行走天下，並合照留念）。不過，詩人西西畢竟是這座城市的一份子，她的生活態度正好突破了華文都市文學寫作的舊框架，成為一種「城市文明原罪派」

²⁴ 西西：〈長著鬍子的門神〉，《大拇指周報》第 15 期，第 9 版，1976 年 1 月 31 日。

²⁵ 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是天花的重災區，到 1970 年代雖然得到控制，但「1974 年 1 月 1 日-6 月 30 日，印度發生嚴重的天花流行，患者 10 萬人，死亡 3 萬人」〔詳見石火編輯部：《引世界惶恐之流行病》（新竹：凌網科技，2006 年），無頁碼〕，所以整個局勢還是相當緊張，無論是搭乘飛機或郵輪外出旅行，出發和到港都會檢查牛痘證。西西的行李控制在四十四磅（二十公斤），應該是搭飛機，郵輪的乘客行李不限重。世界衛生組織於 1979 年 12 月 25 日才正式宣佈天花自地球上根除，並全面停止施打牛痘疫苗。

²⁶ 根據 1976 年的統計數字，香港「單人住戶」為 14.8%，「未擴展的單核心家庭住戶」為 60.2%，兩者合計 75%。《香港的發展（1967-2007）——統計圖表集·表 1.10 住戶結構》，頁 20。

詩人可願意承認的類型——快活且自在的都市人。

快活且自在的現代都市生活敘事，也出現在同一年發表的〈快餐店〉（1976）：

既然我看見了石油氣爐的煙就皺眉又負擔不起煤氣和電費
既然我認為一天花起碼三個小時來烹飪是一種時間上的浪費

既然我高興在街上走來走去
既然我肚子餓了就希望快點有東西可以果腹
既然我習慣了掏幾個大硬幣出來自己請自己吃飯
既然這裡面顯然十分熱鬧四周的色彩像一幅梵谷
既然我可以自由選擇青豆蝦仁飯或公司三明治
既然我還可以隨時來一杯阿華田或西班牙咖啡
既然我認為可以簡單解決的事情實在沒有加以複雜的必要
既然我的工作已經那麼令我疲乏
既然我一直討厭洗碗洗碟
既然我放下杯碟就可以朝戶外跑
既然我反對貼士制度²⁷

西西列舉了一串看似率性的理由（全詩總計用上二十三種「既然」），完全日常的，節奏感十足的口語化敘述（讀來有點像幾年後從四川崛起的中國第三代詩歌），為她選擇快餐店的理由增添了一股理直氣壯的味道。在西西看來，這才是現代香港人的當然選擇（勞累的女性上班族根本不想在下班後再煮飯再洗碗），而且也是國際大都市獨有的選項，在落後一些的亞洲城市根本沒得選，更別說一般鄉鎮。1976年全球華人社會中真正的大都市不多，香港在都市文化成熟度上遙遙領先，「外食普及率」或許可以作為都市化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在某些人眼中那可是都市化帶來的負面效應）。西西寫的〈快餐店〉距今四十三年，還是很符合當今外食族的消費心態和需求，連空間感都相似，把它當作2019年寫的詩也不會有人起疑。若將鏡頭拉回經濟起飛前的香港，最早出現的快餐店鼻祖，竟然是1963年創立的「時

²⁷ 西西：〈快餐店〉，《大拇指周報》第12期，第6-7版，1976年1月8日。修訂版見西西：《西西詩集》（臺北：洪範，2000年），頁7-8。修訂版刪去四種「既然」。

新港式快餐店」，賣港式漢堡包，很時髦；其後，又有 1968 年創立的「大家樂連鎖式餐廳」，發展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家分店；到了 1975 年，銅鑼灣第一家麥當勞開幕，²⁸之後快餐店如雨後春筍冒起，香港進入快餐業的戰國時代。1976 年的西西毫不抗拒地迎接嶄新的快餐店紀元，理所當然的成為熟客，她的消費包含了對新興都市消費文化的認同（當然她本身就喜歡這種無負擔的單人飲食方式），是一個文化過程。這種態度跟台灣和東南亞都市詩的寫作慣性大相逕庭，也有別於過去的香港都市詩。何麗明說得很對：「西西或諧或莊的詩歌道出了這個城市及其居民的品格。她的詩歌也證明了一個城市的故事不必是宏大的敘述，而可以是表面瑣碎的絮語，寓言或者童話。」²⁹

西西從來不打算讓她的都市敘事淪為早年香港現代主義或寫實主義詩人筆下，那種主題或理念先行的硬式載體——無論是劉火子（1911-1990）在〈都市的午景〉（1934）和〈晨興〉（1935）裡用冷斂的象徵系統來表現抽象都市精神、李育中（1912-2013）悄悄走進〈維多利亞市北角〉（1934）去營造跟自己一樣寂寥的城市景觀、鷗外鷗（1911-1995）特寫軒輊詩道的〈禮拜日〉（1939）、馬博良（1933-）以疲憊和虛無感去貫穿由白日喧囂轉為寂靜暗夜的〈北角之夜〉（1957）、馬覺（1943-）飽含存在主義色彩的〈現代建築〉（1961）；又或者，如左翼詩人陳殘雲（1914-2002）對現代都市文明表現出極度厭惡和扭曲心理的〈都會流行症〉（194?）和〈海濱散曲〉（1941）、黃雨（1916-1991）把人性的貪婪和醜陋進行刻板化描繪的〈上海街〉（1949）、盧璟（1928-1996）將店舖街景寫成一灘死水的新墟呵，新墟〉（1948）。³⁰兩邊都是中國南來詩人，心裡缺了一個孕育過個人成長經歷的香港，甚至可以說是「詩中無香港」，這座移民之城只是各種西方文學主義的載具。兩邊都不是西西想走的路。

無論是〈快餐店〉或〈長鬍子的門神〉都寫得較軟，感性而且貼身，且帶有

²⁸ 麥當勞接著在 1979 年進入新加坡，1982 年在吉隆坡開業，1984 年才到臺北（台灣都市詩名家羅門在 1985 年才有機會寫出〈「麥當勞」午餐時間〉）。

²⁹ “Xi Xi wins 2019 Newman Prize”, MCLC Resource Center. <<https://u.osu.edu/mclc/2018/10/10/xi-xi-wins-2019-newman-prize/>>, 檢索：2019 年 7 月 15 日。此為「2019 年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獎」評審委員何麗明推薦西西的提名詞。

³⁰ 本段所論及的都市詩，舉凡發表於 1930-1940 年代的，皆選入陳智德編：《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新詩卷》（香港：商務，2014 年）；1950-1970 年代的，皆選入陳大為、鍾怡雯編：《華文文學百年選·香港卷〔壹〕》（臺北：九歌，2014 年）。在此一筆帶過，不再細談。

濃淡適中的粵式中文味道，輕巧扣住 1970 年代香港上班族的生活感受。詩裡描述的生活狀態有了真誠、生動的血肉，語言有了十分難得的港式韻味，往「我城」的都市歸屬感前進了一步（這兩首詩幾乎可看作「詩版」的《我城》，寫了兩種達觀、活得自在的城市新人類），同時也提前熟成了香港都市詩，不再那麼生硬難啃。可惜西西前進了一步又停了下來，毅然轉向小說創作。

香港都市敘事的第二座地景是梁秉鈞（1949-2013）。

梁秉鈞出生於廣東新會，1949 年隨父母來港定居，他認識的第一片土地就是香港，跟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沒什麼兩樣。自 1973 年底開始，他連續八個月發表了八首有關香港「地方」的詩。³¹轉換成畫面，就像有一位二十四歲的在地年輕詩人，獨坐街頭，用碳筆素描所見的香港一隅。既無都市詩的意圖，亦無城籍概念，純粹的地方素描（在很多年後被重新定位為地誌書寫的先驅性成果）。在《我城》全書完成連載之後，梁秉鈞似乎察覺到一些較深刻的東西，接著發表的兩首詩，分別加上副題：〈華爾登酒店——「香港」之九〉（1975/08）、〈影城——「香港」之十〉（1975/09），但作用不大。這十首詩當中，寫得比較有代表性還是〈中午在鰂魚涌〉（1974），梁秉鈞完全甩掉 1950-60 年代前輩詩人那種理念先行、負面批判的載具式寫法，他寫的是另一種日常，有別於西西對香港都市文化精神的勾勒，他老老實實記述了中午在鰂魚涌所見：

有時工作使我疲倦
 中午便到外面的路上走走
 我看見生果檔上鮮紅色的櫻桃
 嗅到煙草公司的煙草味
 門前工人們穿著藍色上衣
 一群人圍在食檔旁
 一個被子用鹹水草綁著一隻蟹
 帶牠上街
 我看見人們在趕路

³¹ 〈傍晚時，路經都爹利街——香港·一九七三〉（1973/11）、〈五月廿八日在柴灣墳場〉（1973/12）、〈北角汽車渡海碼頭〉（1974/01）、〈寒夜·電車廠〉（1974/02）、〈羅素街〉（1974/03）、〈拆建中的摩囉〉（1974/04）、〈中午在鰂魚涌〉（1974/07）、〈新蒲崗的雨天〉（1974/07）。

在殯儀館對面
花檔的人在剪花³²

鰂魚涌是人口極為密集的地區，住商合一，舉目望去全是小面積的寫字樓和住宅大樓，密密麻麻的空間結構，天空被吃剩一小片，令人透不過氣來。梁秉鈞沒有採取前輩詩人慣用的批判性視野去控訴這座城市對居住者的壓迫，反而以在地人的感受，習以為常的口吻，描述從寫字樓走出來透透氣的上班族，在午餐時段出來逛逛，平和、中性、視覺系的街景陳述，記下鰂魚涌街市的日常所見。只不過這畫面沒有透露出市民對生活的想法，也沒有透露出「我」的想法。此時梁秉鈞還年輕，尚未思考城籍或地誌書寫，也沒感受到九七，只是隱隱然的想為眼前的香港生活留下一點什麼。此詩建立了梁秉鈞後期都市詩的「基本款」，梁秉鈞後來日益清晰的「地誌詩」創作概念，回過頭來深化了這一系列「香港素描」的詮釋空間。

如果讀細一點，會發現梁秉鈞使用的是嚴謹的「書面中文」，從構思到下筆，腦海中運作的是香港人日常生活中不使用的華語，它只是一種純粹印製在書面的正統中文，字正腔圓，舉止拘謹，卻因為跟現實生活存在著隔閡，因此寫來缺乏表情和個性。這種書面中文的來自梁秉鈞的學養，不是平時說話的語氣，正經八百的場景敘述反而阻絕了港式中文的用語慣性。反觀西西在〈長著鬍子的門神〉和〈快餐店〉都適度融入一些不干擾華語讀者的粵語詞彙，像香港人在說著不純正的港式中文，懂粵語的就多悟一分味道，不懂也無傷。西西的語言實驗見證了香港已然成形的粵語化社會結構，一如前文所述，當時港式粵語流行文化開始輸出到東南亞華人社會，詩歌裡的地方性語言特色也同步輸出。

西西發表《我城》和〈肥土鎮的故事〉之後，幾乎休止了詩歌創作。梁秉鈞的香港素描也止於十首，便轉向其他主題，他甚至沒有回應 1982 年的中英談判，或鄧小平在 1984 年承諾的「五十年不變」。隔了快十年，梁秉鈞才現身在〈老殖民地建築〉（1986），彷彿在回顧中緬懷這一齣即將劇終的殖民地電影：

這麼多的灰塵揚起在陽光和
陰影之間到處搭起棚架圍上

³² 梁秉鈞：〈中午在鰂魚涌〉，《中學生周報》第 1127 期，第 7 版，1974 年 7 月 5 日。

木板圍攏古老的殖民地建築
 彷彿要把一磚一木拆去也許
 到頭來基本的形態仍然保留
 也許翻出泥土中深藏的苦酸
 神氣的圓頂和寬敞的走廊仍
 對着堵塞的牆壁也許劈開拆毀
 梯級也許通向更多尋常的屋宇³³

這棟翻修的英殖民風格的老建築是香港大學最古早的本部大樓，1912年啟用，1985年成為香港法定古蹟，亦是梁秉鈞任教的文學院所在地。緬懷「舊香港」，順勢發展成梁秉鈞的「基本款 2.0」，在老舊的空間裡尋找細節，像一個不跳接的連續性鏡頭，努力捕捉時間的殘骸。老建築的修護總有很多不確定性，此詩卻沒有明顯的情感起伏，敘述上的瑣碎造成局部的冗長，勉強創造出香港都市空間內長期缺乏的人文氣息。香港的「舊」不是鏽，它是一枚反覆敲打的釘子在提醒港人遺忘的（英殖民）歷史。「舊香港」在九七後的幾年迅速發展成一股浪潮，他們緬懷的不是英國殖民政權，而是「我城」的身世，以及自己那段一去不返的成長歲月。³⁴

就在梁秉鈞特寫老殖民建築的同年 10 月，「事頭婆」³⁵英女皇與皇夫應訪問中國，隨後搭乘皇家郵輪不列顛尼亞號（Royal Yacht Britannia）訪港三天，事頭婆在何福仁（1950-）的〈維多利亞港〉（1987）留下虛幻的身影：

我五歲的姪女把家裡的魚缸
 定名為維多利亞港
 那是英女皇蒞臨的一天
 她第一次乘搭渡海小輪
 從一個距離發覺自己生長的地方
 黃埔的樓宇愈伸愈長愈高

³³ 梁秉鈞：〈老殖民地建築〉，《梁秉鈞 50 年詩選〔上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年），頁 57。原題〈勉葉〉，刊於《九分壹》創刊號（1986 年 11 月），頁 4。

³⁴ 劉紹銘編：《舊時香港》（香港：牛津大學，2002 年）即是一部具有象徵性意義的選集，主要收錄九七前後幾年的懷舊散文。

³⁵ 粵語裡的「事頭婆」即是老闆娘。

卻原來一直浮在海上
那些密麻麻的積木
許多人就在裡面讀書工作
海邊尖東走廊有人不停追趕
追趕什麼呢也沒有人停下來想想³⁶

女皇來港絕對是政治和傳媒上的大事，何福仁那天真的姪女，在這一天像個女皇一樣命名了自己（殖民）的魚缸，也搭了小輪，因此發現了繁華的黃埔實如浮島（肥／浮土鎮），裡頭有無數的女皇子民在瞎忙窮忙，女皇管不了他們。接下來姪女的魚缸成了維多利亞港的隱喻（粵語中的缸〔gong1〕、港〔gong2〕二字，同音異聲），但它小得連地圖都忽視，更沒有人理會它的水溫或是否缺氧，終成棄子一般的存在，如同最終被女皇放棄的維多利亞（港／缸）。年幼的姪女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何福仁祈望「只要一家人同心協力／當風翻動，波濤再洶湧／我們總會安然渡過／而且總會有什麼吸引她的目光」，³⁷離開這裡，「許多年後，她一定會看到許多許多個真正的海洋」。³⁸港人在面對越來越靠近的九七，除了留下和離開，沒有第三選擇，他們必須更認真去反省自己的角色，規劃未來的命運。³⁹香港人對未來的命運產生很深的無力和無奈，一如「香港搖滾之父」夏韶聲（1952-）的單曲〈說不出的未來〉（1988）當中所透露的心聲。

兩年後，梁秉鈞終於在〈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1989）裡討論敏感的身份（城籍）問題，他說：「香港作者對自己身分的反省，當然亦有各種不同態度、不同方法。一種做法是與其他時空的比較來界定，或者從與他人的關連中回頭反省自己，從自己所『不是什麼』來界定自己是什麼。對於文化身分的追尋，往往亦從如何描繪『他人』開始。這『他人』可能是其他來到這片土地上的人，也可能是離開這片土地所遇到的種種不同的人」，⁴⁰梁秉鈞的提問，連他自己都沒有答案。

³⁶ 何福仁：《如果落向牛頓腦袋的不是蘋果》（香港：素葉，1995年），頁178-179。

³⁷ 同前註，頁180。

³⁸ 同前註。

³⁹ 張炳良：〈香港身份：本土性、國族性與全球性的交織〉，收入呂大樂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2011年），頁7。

⁴⁰ 梁秉鈞：〈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第53期（1989年5月），頁18。

曾在 1995-1997 年間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的張炳良教授（1952-）認為「香港身份乃是三種力量（本土化、國族化和國際化）所交織和形構的獨特歷史經驗。……由於被英國和中國拒絕賦予國民身份，香港華人別無他選，只好擁抱香港作為自我認同，並逐漸產生出自己的元素，包括：香港的經濟成就、國際形象、獨特的本土廣東文化及生活方式」，⁴¹香港人就這樣適性逍遙的，被動的生活下去。然而「在回歸前那緊湊時刻，中國希望香港是一個只有少量政治變動的經濟城市。另一邊廂，經過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地統治，回歸前的香港已變成一個非典型的殖民地，儘管殖民者從沒有這樣的打算——過時的管治制度，卻配以走在現代前線的經濟、公民社會、法律和行政體系。這是固有的矛盾，又或正面點說，是當代香港的『雜交』特質：殖民地與現代性、中式與英式的並存」。⁴²並存即是一切矛盾的根源，雙重非典型的「我城」能不能順利融入「祖國」的懷抱呢？「祖國」能否堅守「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呢？

三、亂局之始：回歸前後的危城

在梁秉鈞發表〈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1989）討論城籍問題的前夕，「祖國」在 4 月中旬出了些亂子，天安門廣場原本單純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擴大了訴求的層面，5 月開始有大規模的學生絕食，大量官方和地下的消息進入香港傳媒，引發各界高度的關注，越靠近六月，北京和香港的共震越劇烈，到了 6 月 4 日真正發生悲劇那一天，香港人也崩潰了，一百五十萬人上街遊行，⁴³拉起「今日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的口號布條，一股極為深層的恐懼就這樣銘刻到骨子裡去，成為世襲的禁咒。

西西在 6 月 11 日發表〈天色微明〉，代入當事人的視角來紀錄這一場悲劇：「天色微明。我們／不斷，一群連接一群／從地面升起／密佈廣場／寬闊的上空」。⁴⁴7 月，梁秉鈞發表了〈廣場〉、〈家破〉、〈家具〉三首詩，整體來說寫

⁴¹ 張炳良：〈香港身份：本土性、國族性與全球性的交織〉，頁 3-4。

⁴² 同前註，頁 7。

⁴³ 原本相信《基本法》能夠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從 1988 年 9 月的 44% 暴跌到 1989 年 10 月的 25%，不信者暴增到 69%。詳見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第二版（香港：圓桌文化，2015 年），頁 376。

⁴⁴ 西西：〈天色微明〉，《星島日報》星期日雜誌，1989 年 6 月 11 日。

得比較迂迴，唯有〈家破〉比較明確、清晰表達了「今日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的憂患意識，以及共赴國難的立場，詩一開頭就說：「我們要不要離開這個家？／同在一起已有好一段日子／我們逐漸成了彼此的靠椅／一起改變不能改變的屋宇／拆下牆壁清理累積的污垢／只不過想有更寬大的客廳／包容各種不同意見的客人」，⁴⁵從民主國家百姓的立場來看，這要求不過份，可惜這場面對專制政權的抗爭非但徒然，還招來毀滅性的結果。詩末六行，具象的殺戮場面和抽象的理想幻滅，得到應有的平衡，他說「忽然有一陣甚麼輾裂的聲音／啪啪的巨響來到我們之間／地面動搖人像玻璃和花盆那樣醉散／在砸爛的泥土上我連忙扶你起來／卻發覺，你這答應與我重建一個家的／卻好似再也站不起來了」，⁴⁶情感的適度壓抑，且暗示性的語言拿捏到好處，讓此詩達到一個理性的思考高度。一小撮老百姓家破人亡，對專制政權來說，是最小的代價。

北京學生的「家破」，對即將回歸「祖國」懷抱的港人來說，是一場令人心寒的「家法」。

隔年 4 月，西西再發表了一首〈六月〉（1990），心境看似回到生活的正常軌道，她在詩的前兩段拜會了一位北京友人，一起逛民辦、書舍、唱搖滾的咖啡店，平平淡淡的日子，她覺得「能夠坐在這裡／一塊兒聊天／真好」，⁴⁷可是六月天，竟然「下雪了／從飯店的露臺／我們看見，銀白／美麗的長安街」，⁴⁸她不會忘記，任誰都忘不了——解放軍坦克如何血洗長安街，以及隔天在長安街上孤身阻擋坦克的偉大身影（「王維林」），但西西沒有下重手，反而以「童話世界的糖粉」輕輕帶過，一如被中共徹底粉飾過的長安街。無人不曉的典故「六月飛霜」在此完美的重現人前，在自以為水過無痕的長安街。西西只是淡淡的述說未來的事：

每年六月，我們孕育
遠行的夢，看一點
山水，買一點書
探訪朋友。六月

⁴⁵ 梁秉鈞：〈家破〉，《游離的詩》（香港：牛津大學，1995年），頁 25。

⁴⁶ 同前註，頁 26。

⁴⁷ 西西：〈六月〉，《西西詩集》，頁 190。

⁴⁸ 同前註，頁 191。

又來了，天色
詭異，你們那裡
驟然雪崩，透過
熒光屏幕，坦示
慘白的廣場，都城
滿罩濃霜，寒流
不斷擴散，所有的人
震驚

這麼嚴峻的六月
你好麼？只有
降溫的消息，太冷
太冷了，遠方的景物
凝結成冰⁴⁹

輕描淡寫地深入話題的禁區，讓六月和雪，聯手說了整個故事。此詩高明之處是：落子在日常，孕育遠行的夢，看一點山水，買一點書，探訪朋友的，毫不做作的日常，讓人以為一切塵埃落定，當月曆翻到六月，「六月／又來了」，天安門事件即如時令般浮現，六月是要飛霜的。簡單的一句「你好麼」，不帶半點政治，只代表西西和大部分香港人——對每一個在事件中蒙難的個體生命——的關切，儘管遠方傳來的，「只有／降溫的消息」。

後來風雨逐年平息下來，香港每年六四必有一場追悼晚會，彷彿在提醒港人：莫忘六四。夾在回歸的希望和憂慮之間，「六四陰影」在晚會的燭火裡閃爍，自我壓抑著。陳滅在回歸前夕，很平靜的寫了一首〈越過維多利亞港〉（1996），寫他自己（其實也包括大部分香港人）坐小輪過海的日常生活心境，宛如「蒼老的小輪／烈日下閉起了眼睛」，⁵⁰波瀾不興。

回歸祖國的日子終於到了，1997年7月1日00時，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全球矚目的大事。打從年初，就有滿山滿谷的頌詩在《文匯

⁴⁹ 同前註，頁191-192。

⁵⁰ 陳滅：〈越過維多利亞港〉，《單聲道》（香港：東岸，2002年），頁32。

報》和《大公報》登場，除了少數來自中國內地詩人的手筆，其餘皆無名之輩，總之大家都十分歡欣，中共總算收回了象徵著莫大屈辱的殖民地。

臨近「七一」，在地學者黃維樑（1947-）發表了四首七言打油絕句，期許著未來；香港詩歌協會會長秀實（1954-）則認為「這是一件千年盛事。每個中國人和香港居民都感到高興」。⁵¹西西呢？西西跟很多香港中老年人一樣在公園練起太極，她寫了一首〈雲手〉（1997）：「宇宙何等遼闊，哪裡／沒有我伸舒的空間？我去／繼續練習雲手，這些年來／雲手引導我更心平氣和，教我／對一切可以寬容的寬容」；⁵²同時也寫了某一天雨後帶把傘，聽著柴可夫斯基，一路穿過歷史博物館、亞洲藝術節廣告，到書店逛逛的〈這個星期日的下午〉（1997）。日子還是要過的。

詩歌對回歸的抵抗意識降低，跟亞洲金融風暴脫不了關係。

回歸的第二天，7月2日，泰國政府將固定匯率制改為浮動制，直接引爆一場金融風暴。10月下旬，以索羅斯（George Soros, 1930-）為首的國際投機客轉向襲擊香港，對沖基金對港幣展開長達十個月，先後四波的攻勢（1997/10、1998/01、1998/06、1998/08）。1998年8月，「港府共耗費過千億元的外匯儲備，成功擊退索羅斯。然而，香港經濟在這場戰役中亦損失慘重，恆生指數一度跌穿6600點，此役雖然成功捍衛港元，但亦重創香港經濟」，⁵³並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失業潮，香港的GDP花了六年才恢復到1997年的水平，但經濟持續低迷。

經濟動盪不安的六年，無形中遮蔽了港人對回歸的抗拒與不安，這座城市的政治局面反而平穩。2003年3月，SARS爆發大規模感染，全港學校停課，三個月內內死亡人數299人，並致使全港服務業陷入大蕭條。7月，為了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⁵⁴爆發五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再度引發身份議題的討論，「香港核心價值運動」順勢而起，形成「『北

⁵¹ 秀實：〈回歸時節話文壇〉，《新晚報·晚風》第235期（1997年7月20日），頁11。

⁵² 西西：〈雲手〉，《西西詩集》，頁189。

⁵³ 秦晞輝：〈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香港01周報》第64期，B19版，2017年6月12日。

⁵⁴ 此條文內容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https://zh.wikipedia.org/wiki/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檢索：2019年3月23日。

京中心』的國族化與『香港中心』的本土化」⁵⁵對抗。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唯一容許街頭運動的地區，這對港人「抵抗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的成形有莫大的影響。

台灣學者夏鑄九（1947-）曾指出：「在人民參與各種都市運動——不論成功與否，例如古蹟保存、住宅、交通、社區、環境、性別、弱勢階級等等都市領域（urban dimension）——的過程中，發現彼此的共同利益，也分享彼此的生活，建立了互相信賴及親暱的關係，這樣就產生了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也對空間產生了新的意義，形成對城市與地方的認同」。⁵⁶香港的城市抵抗運動大多是針對政治議題的抗爭，不管是思想的自由、或維繫一國兩制的法治獨立性，帶有大英帝國殖民元素的「維多利亞公園」是每一次群眾運動的「主場」，可容納十八萬人，每年「六四」紀念活動都在這裡。人數再超出，即成為具有龐大動能（在官方看來是「暴動潛能」）的街頭運動，五十萬人上街，大量對港府或中聯辦不滿的訊息匯流於此，原本潛伏的「抵抗性認同」統統浮出地表，增強了「我城」的歸屬感，也增強了對「其他人的祖國」的敵意。

五十萬人的場面讓港府坐不住，陳滅也坐不住。當年橫渡維多利亞港的心情不再，陳滅硬是按捺住怒氣，寫下〈開始夜了〉（2003）：

煙霧持續迷漫卻連煙霧本身也昏暗
 它苦苦要遮蔽的卻是什麼呢？
 人們終於起哄，浮出一個一個白色話圈
 奄奄升入空氣再溢出漫畫格外
 ……………
 到處都有互相告別的聲音
 人群彼此揮手卻一一逗留，沒有離去
 沒有輓歌、沒有吞聲和垂淚，只是夜了
 黯淡身形模糊了輪廓，把我們真正疏離⁵⁷

⁵⁵ 張炳良：〈香港身份：本土性、國族性與全球性的交織〉，頁 11。

⁵⁶ 夏鑄九：〈都市抵抗、市民認同、以及城市的營造——珠三角全球都會區域中香港的都市動員〉，收入本土論述編委會、新力量網路合編：《本土論述 2009》（臺北：漫遊者，2009 年），頁 7。

⁵⁷ 陳滅：《市場，去死吧》，增訂再版（香港：石馨文化、香港文學館，2017 年），頁 114。

陳滅的敘述依舊低調，他沒有正寫港人對條文的激情抗爭，反而去關注大遊行入夜之後的人群互動，因為他清楚感受到一股無以抑制的民間力量在街頭凝聚，現場無一人肯離去。比較特別的是陳滅借用漫畫裡的「一個一個白色話圈」，突出了都市街頭運動裡的重點——人民的心聲，儘管它們不一定被聽見（即使它們轉型成一個一個抗爭標語），儘管它們終究一一飄散開來（既是渲染，也是宣洩），但所有話語的主人仍舊緊緊的守住自己的立場和權益。

街頭運動再度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民主角力場。

2003年還有反維多利亞港填海的抗爭，2006年12月又有拆卸中環天星碼頭鐘樓所引發的大規模抗爭，為了保住「我城」的歷史遺蹟，民間團體不惜與港府一戰，因此造成嚴重的社會衝突。鄭政恆（1981-）的這首〈在碼頭吹吹風的日子〉（2006），象徵著年輕世代的抵抗：「風很大的日子／我跟你到碼頭吹吹風／碼頭是我們的／鐘樓是我們的／官僚不是我們的／謊言不是我們的」。⁵⁸鄭政恆二十五歲，這座年近半百的第三代中環天星碼頭鐘樓（1958-2006）一直矗立在他的成長歲月中央，它是香港人集體記憶中的相當重要的地標，港府為了擴建碼頭打算將之拆除。鄭政恆要維護的是「我城」記憶和歷史建築，「作為一個居住在香港的城市人，呈現香港我城生活片段是最自然不過的了，不論是半山舊區、天星碼頭、皇后大道，還是赤柱墳場，城市景觀都保留著集體或個人的記憶。我是一個懷舊的人」，⁵⁹二十五歲青年的懷舊，其實是一種以「我城」包裹著「舊香港」的世代氛圍，溫和的城籍意識在族群間漫延開來，慢慢成為形象感十足的本土意識，殖民地舊香港確實比任何摩天大樓或高鐵更容易成為香港最具溫度的形象。「整個運動在最早期的成功之處，無疑是把天星鐘樓打造成香港的地標圖騰，從而抓緊大眾對鐘樓的想像。藉文化保育的訴求、民間情懷與身份的論述，天星的保育運動把市民的日常生活與天星鐘樓連繫起來」，⁶⁰最終召喚出集體記憶、本土認同，⁶¹和懷舊的詩歌，一起來面對接連消逝的美好事物。

⁵⁸ 鄭政恆：《記憶前書》（香港：三聯，2007年），頁83。

⁵⁹ 鄭政恆：《記憶前書·後記》，無頁碼。

⁶⁰ 谷淑美：〈香港城市保育運動的文化政治〉，收入《香港·生活·文化》，頁93。

⁶¹ 徐承恩提出對這場抗爭的看法：「這種本土認同開始超越主流大中華文化主義之想像：香港人就是香港人，而不是保存了某種失落華夏文化的特種中國人。此認同亦強調此時此地（here and now）對普羅民眾之充權，令香港公民國族主義之發展更上一層樓。」詳見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第二版，頁417。

這一年，陳滅寫了〈香港再見〉（2006），跟生活過的「我城」道別，詩的前兩行的語態是優雅的，「說再見給下著微雨的夜／說再見給自己的影，它也要說再見」，接著他掃瞄了城市裡各種各樣的人生及其生存境況，到了第四段，他的「再見」越來越沉重：

再見沒有名字的學院大門外
沒有名字的我們
再見強光下顛倒的明暗
再見了城市的夜再見那給霓虹照亮的
渴睡的路燈、低矮樓房的窗
或高聳大廈通向虛無的尖頭
再見了無法不用放緩的話去掩飾
一聲重重壓抑的歇斯底里

再見了從高樓躍下的渴望
再見了用我擺動的影
說再見給不由自主的路燈
一切都再見了只有它們
以被霓虹燈照亮的身軀去照亮
察覺路徑已被設定的人們
無意再見的雨夜⁶²

當時三十七歲的陳滅在詩裡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悲觀，彷彿眼前美好的一切終將逝去，一路上跟深陷在生活底層的市井小民、追趕巴士的男子、不肯歸家的少年、7-11 商店、高樓矮窗、冷和熱、光和影，一一道別。他最感傷的是他／它們都未能察覺到命運已經被設定，朝著灰暗的方向前進，這城市被黑白顛倒的話語籠罩，被強大的自我壓抑粉飾，沒有人能夠真正改變它，只能跟曾經美好的、充滿希望和正向的「我城」道別。「香港再見」是低迴的憂傷，甚至是訣別。翌年，他借夏韶聲的歌名寫了一首同名的〈說不出的未來〉（2007），接著又寫了九首同類型詩

⁶² 陳滅：《市場，去死吧》，增訂再版，頁 92-94。

作。陳滅心中「我城」的燈火，已滅。

四、守護我城：從燭光到戰火

鍾國強（1961-）讀了這首〈說不出的未來〉，以及收錄此詩的詩集《市場，去死吧》（2008）十分感慨，也憂慮，他說：「讀憤怒的詩，或滿是抗議聲音的詩，常常心中不期然生起戒懼：對於詩所怨怒的事情，或所反抗的對象，雖常有「敵愾同仇」之心，但對於詩之自身，很多時讀著讀著總覺得它被過盛的怒火燒傷了。……讀著這些詩作，尤其是卷2『流浪到七一』的『回歸十年紀念』系列以及書題詩〈市場，去死吧〉，都對那種透紙而來的怒氣不無擔憂：在揭陳時弊、怒而抗爭之餘，於詩是否有所斲害呢？」⁶³

當這一座城市的寫作漸漸深入政治詩的腹地，現實生活的殺戮之氣，會不會像雷雨包一樣遮蔽詩歌語言的藝術光澤？讓憤怒的文字淪為吶喊？這個問題也是鍾國強的自我詰問，他跟所有香港詩人一起目擊了後來陸陸續續發生的大事，有十五萬港人去參加2009年的「六四」二十週年燭光晚會，接著又有九萬人在2012年遊行抵制即將在小學推行的紅色洗腦教育，所有的小學生都得進行對祖國「情感認同」的評核，鍾國強當然憤怒，但沒有亂，至少心沒有亂，他鎮定地寫下〈孩子樹〉（2012）：

孩子們全部都舉起手來
等待風

根都給掘出來評核
有沒有被觸動⁶⁴

鍾國強及大部分香港人對這「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都很反感，他們知道孩子是天真的，聽話，叫他們舉手就舉手，進行什麼樣的考核都不會反抗，百年樹人，果

⁶³ 鍾國強：〈那些說出的與沒說出的——讀陳滅〈說不出的未來〉〉，《浮想漫讀》（香港：文化工房，2015年），頁88。

⁶⁴ 鍾國強：《開在馬路上的雨傘》（香港：文化工房，2015年），頁88。

然先從「孩子樹」(樹苗)階段下手，還可以很具體的考核，以完成一種連根拔起的洗腦教育。「孩子樹」的意象簡單，卻是一個訊息強大的符號，而且形象鮮明。

接下來鍾國強和他的詩共同弔唁了 2013 年 1 月過世的老朋友梁秉鈞，寫下致敬的詩篇〈傍晚在鰂魚涌〉(2013)；共同目證了一場接一場的街頭運動，眼睜睜看著香港成為一座堆滿易燃物的「抵抗之城」。沒有人曉得鍾國強究竟有沒有參加翌年「七一」的五十萬人大遊行，但他肯定非常關注 9 月發生的 13,000 名大專生為爭取真普選而罷課(全港大專生才 96,000 人)，這一罷大學就停擺了。當在遠在北京的人大為普選「落閘」之後，他寫了三首詩，像憤慨揮毫的文士。等到 9 月 28 日正式啟動佔中行動，鍾國強跟 2003 年的陳滅一樣坐不住了。

香港警方在當天黃昏動用七千武裝警力和他們的催淚彈強行驅散，這一幅觸動了港人多年來內心深處最大的「恐懼」，反而激發原本支持和不支持佔中的民憤，歷時三個月的街頭運動就這麼爆發了，一百二十萬人佔據了核心商業區的主要幹道，以靜坐癱瘓市區。示威群眾用黃色雨傘抵擋警方的胡椒噴霧，故媒體稱之為「雨傘革命」或「黃雨傘運動」。鍾國強在「黃雨傘」的第三天(9 月 30 日)寫下他的憤慨〈打開，為了可以收藏——詩援雨傘運動(一)〉(2014)：

路都由我們的腳走了出來
煙霧中一把遠遠都看清了的傘
打開，為了可以收藏
在將來無數個晴天中可以
跟孩子們再走一段路⁶⁵

語言裡散發的憤慨是收斂的，鍾國強以詩篇走進黃雨傘的陣地，祈望這一代人的努力(把抗爭的傘打開)，能夠讓下一代人可以收穫(收藏)到美好的光景。「打開，為了可以收藏」是柔性的理念，他試圖為這場運動找到理性的立足點。很不幸的，這場民運拖久了，形成長期佔領街頭的膠著局面，影響了港人的交通、民生、經濟，讓抗爭者陷入困境。鍾國強的信念雖未動搖，但他對革命的前景深感憂慮，在街道上的抗爭者只有一柄用來防禦催淚彈、警棍、胡椒噴霧和水劑的傘，詩人只有詩，都很脆弱，但這是退無可退的唯一防線，他們的堅持卻換來部分市

⁶⁵ 同前註，頁 132。此系列詩共四首，另有〈佔領物語〉五首，都是聲援佔中之作。

民的不諒解，以及港府的冷漠。於是鍾國強在 11 月 8 日寫下〈開在馬路上的雨傘——詩援雨傘運動（四）〉（2014）：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不等雨也不等風
承著腳步那麼多天了
只有瀝青可退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綻開了石壘邊的兩片葉
夜涼了腳踝縮回營帳
天末一燈如豆仍黃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是尾站的空巴士
給遺忘了的一些甚麼
角落的黑，沒有一聲呼喊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沒有像傘一樣合上
開在雨傘上的馬路
也沒有像路一樣好走⁶⁶

鍾國強嘗試進入抗爭者的焦慮、虛無的內心，曠日廢時的街頭運動已經讓大家兵疲馬憊，堅持變成僵持，並非大家的初衷，但只有瀝青可退了。他的詩也沒從審美的防線退下，他堅持形塑意味深長的畫面，譬如「夜涼了腳踝縮回營帳／天末一燈如豆仍黃」，無一聲喧囂，畫面裡的一動一靜，流露出重低音般的孤獨。這首詩不起硝煙，思緒靜靜穿透入夜的街頭，最後一段寫得很有力量，而且憂傷，抗爭不見盡頭，路難走傘也難收。鍾國強為黃雨傘運動前前後後寫了九首詩，他的

⁶⁶ 同前註，頁 138-139。

審美防線始終沒有失守。一年後他回想起這段日子：「我們活在這個年代實在無從擺脫政治與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權力運作。有人在雨傘運動期間鼓吹甚麼中立，假客觀、持平、包容之名，多方勸諭，也無非是一種政治」，⁶⁷這期間香港的詩都離不開現實，也就是離不開政治，但詩援雨傘運動有用嗎？「詩可以改變甚麼？雨傘運動期間出現了不少政治諷喻詩、抗議詩。這種常被詩人自嘲為『無用』的詩，究竟又發揮了甚麼作用呢？」⁶⁸

詩不是攻城或守城的兵器，它只能見證歷史。

陷落在黃雨傘催淚彈迷霧中的不只五十三歲的鍾國強，1997年「回歸」香港的廖偉棠（1975-）比任何香港詩人的反應更為激烈，他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前線。廖偉棠跟梁秉鈞、許冠傑、黃霑、顧家輝一樣出生於廣東，不同的是：父親是道地的香港人，他以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獲准赴港。廖偉棠住過內地二十二年，申請了七年才如願來港，他比很多香港人更了解自由的可貴，他帶著相機和筆，走進黃雨傘底下寫了一整本詩歌兼攝影集《傘托邦》（2015），如同一冊事證檔案。三十九歲的廖偉棠是熱血漢子，走入社運的詩寫得特別較尖銳，〈詠物詩〉（2014）竟有刀斧之光：「胡椒不再用來對付蘿蔔糕／而用來爆炒我們的眼球／霧噴湧而出，令城市迷路」。⁶⁹隨著局勢日趨混亂，他開始為大家的安危擔憂，〈趁還記得〉（2014）便營造了危城末日的訣別氛圍：

趁還記得，睡前剃鬚。

趁還難過，夢中再次話別亡友。

趁還痛苦，醒來仍然撫摸這個城市，

讓在海邊徘徊的晨光再次亮透你的衫袖。

〔略〕

趁晝長夜短，收拾好平生故事，落草為寇。⁷⁰

廖偉棠這兩首詩寫得急，難免少了思考的深度和廣度，激烈的街頭抗爭牽動了他

⁶⁷ 鍾國強：〈甚麼也沒有改變——漫談辛波絲卡的影響兼及政治諷喻詩〉，《浮想漫讀》，頁309-310。

⁶⁸ 同前註，頁313。

⁶⁹ 廖偉棠：《傘托邦》（香港：水煮魚文化，2015年），頁28。（稿於2014年10月2日）

⁷⁰ 同前註，頁190。（稿於2014年10月20日）

原本就激烈的情緒，「醒來仍然撫摸這個城市」和「落草為寇」表達了一種絕境中的困獸之鬥，乍讀之下似乎有點誇大。廖偉棠跟現場的港人都清楚——別以為百萬人是能成大事的力量，其實他們都有一種「坐困孤城」的絕路感，香港的處境不會獲得任何一股中國境內力量的支援，它永遠走在政治的邊陲，獨自對抗強大的國家機器。殘酷的是：再龐大的街頭運動，都只是一座都市的抵抗運動。

「我城」被迫淪為困獸之危城。

早在半年前，尚未「落草為寇」的廖偉棠寫了另一首〈又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2014），此詩借了台灣詩人楊牧的詩題，所以是「又」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當風靜悄悄扣緊風紀扣的時候，
和風雨一起咄咄敲窗的，
還有一把匕首；穿黑雨衣的
除了骷髏屠夫，還有一群中學生。
他們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才剛剛長大。」
是的，你們才剛剛長大，
就看見烏鴉趕製了一頂襤褸的天幕。

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是網路上素未謀面的網友，
那些光纖隨時釋放他的憤怒
隨時又把他綁牢。「香港陷落了
怎麼辦？我們還在谷底張望呢。」
一大片陸地向一個小島微微傾斜，
一小片荊棘握住另一小片荊棘，
是的，陷落的時候，
荊棘也能接續

燃燒的手。⁷¹

廖偉棠寫的不是大事，一群中學生問不了什麼家國大事，他們疑惑很直接，直接得讓人難以回答：「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們才剛剛長大。」；素未謀面的網友問得憤怒且含糊，他在焦慮「香港陷落了／怎麼辦？我們還在谷底張望呢。」這些既抽象又實在的詰問背後有非常龐大，大到根本說不清的——大國與小城之間——公理和正義問題。正因為說不清，所以像極了詩歌的意象叢，繪聲繪影，怎麼解讀都行。可是這些十分庶民的感受——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或那樣？有什麼東西陷落了？——可能來自回歸後房價的暴漲，致使孤苦老人和單身人口蝸居於劏房，嚴重的貧富差距造成不公不義的社會觀感；也可能來自港府在政治、立法方面的各種政策偏差，動搖了港人的期待並產生日益嚴重的磨擦；當然少不了來自日常生活的苦悶、擁擠、壓力。香港在這些年，確實失去了昔日的自由和榮光，完全失去英殖民時代的優越感，港人與港府之間的鴻溝越撕越開。雙方只好在拒馬內外對峙，「等待／第一塊石子，第一枚子彈擊出」。⁷²

在黃雨傘運動中最震撼人心的不會是詩歌，而是作為主題曲的——香港殿堂級搖滾樂隊 Beyond 的〈海闊天空〉（1993）和〈光輝歲月〉（1990）。這兩首歌在運動期間簡直成了香港社運的「神曲」。「搖滾樂原本就有反叛批判的含意，甚至，文化研究主張的抗爭文化（politics of resistance），亦深受搖滾樂的反叛精神影響」，⁷³高玉娟進一步指出：Beyond 具有原真性（authenticity）和反抗性（oppositional），他們的創作象徵著堅持到底、抗衡主流價值，而且黃家駒擁有高度的情感能量（affect），也易於撼動群眾，讓群眾的情感／情緒匯流。雖然 Beyond 的歌並不是為社運而寫，不直接指向各抗爭，但與會者藉着一同歌唱，參與了這些歌曲的意義改造，中介了與會者對這些歌曲的想像，把歌詞中的「抱緊自由」、「抗戰」、「堅持信念」、「爭一口氣」等等概念挪用到不同的抗爭脈

⁷¹ 同前註，頁 204。（稿於 2014 年 3 月 3 日）

⁷² 鄒文律：〈拒馬上的啄木鳥〉，收入黎漢傑編：《2014 香港詩選》（香港：練習文化實驗室，2016 年），頁 93。

⁷³ Simon During,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24。轉引自高玉娟：〈社會運動為甚麼要唱 Beyond 的歌？——Beyond 所體現的搖滾原真性及社群力量〉，《文化研究的嶺南》第 21 期（2010 年 11 月），頁 3。

絡之中。⁷⁴〈海闊天空〉最適合挪用的是這兩段：

多少次 迎著冷眼與嘲笑
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
一剎那恍惚 若有所失的感覺
不知不覺已變淡 心裡愛（誰明白我）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
背棄了理想 誰人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無論是意境挪用或詞彙挪用，都不是精確的，也沒人會計較這一點，尤其大夥沉醉在 Beyond 極富感染力的歌聲當中，全部情緒都燃燒起來了，港人要堅守的正是「海闊天空的自由」。吳文基指出：「多少次，迎著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走遍千里」，抽空理解時，都很容易讓爭取權益、而屢屢受挫的社運群眾產生共鳴。⁷⁵這些概括力很強、朗朗上口的歌詞，被群眾運動重新賦予反抗運動精神，並不是很困難的事。

「自由」和「光輝」都是英殖民香港的榮光，或者共同的想像物。

那首原本寫給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1918-2013）的〈光輝歲月〉，略去向曼德拉致敬的前四句歌詞（或首段）之後，整首歌竟然能夠天衣無縫的契合「此時此地」的港人心聲，他們渴望找回的正是「光輝」與「自由」：

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
迎接光輝歲月

⁷⁴ 高玉娟：〈社會運動為甚麼要唱 Beyond 的歌？〉，頁 27。身為 Beyond 歌迷的高玉娟，在這篇論文中訪問了幾位參加社運的民眾對這首歌的想法，鞏固了她的論述基礎。

⁷⁵ 吳文基：〈「今天我」——哪個今天？哪個我？〈海闊天空〉的多重挪用〉，《藝若是 Those As Art》2017 年 12 月 22 日，〈<https://medium.com/those-as-art/今天我-哪個今天-哪個我-海闊天空-的多重挪用-a771633f8384>〉，檢索：2019 年 7 月 21 日。

風雨中抱緊自由
一生經過徬徨的掙扎
自信可改變未來
問誰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
願這土地裡 不分你我高低
繽紛色彩閃出的美麗
是因它沒有 分開每種色彩
年月把擁有變做失去
疲倦的雙眼帶著期望

正是「年月把擁有變做失去」，才迫使百萬港人冒著鎮暴警棍和催淚彈的攻擊上街示威，「只有殘留的軀殼／迎接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如同預言般的寫照。這首歌同樣在佔中期間演唱了無數遍，沸騰人心。搖滾樂跟詩歌不一樣，它是有演唱者的，黃家駒一生的行事風格和音樂理念，以及磁性十足的唱腔，讓所有群眾「在聽〈光輝歲月〉時，一種從一個反叛青年到一個自由火炬的吶喊讓人不由自主的心生感慨，那是一種來自心靈的震撼，讓處在逆境中的人彷彿看到了一絲希望，讓人不由自主的堅強起來」，⁷⁶讓街頭上那些「疲倦的雙眼帶著期望」，堅持下去。

佔中不會永久，眾群意志力的疲乏，和社會成本的累積都很可怕，任何運動都會自高潮滑落，沉澱後衍生出來的問題，雙方皆無力解決。這場民主大戲，有點像前述的〈肥土鎮的故事〉，普選大夢即是如夢幻泡影的肥土，讓黃雨傘革命暴起暴落，走調、失控、解散。經歷了一連串街頭抗爭之後，「中國面對香港時，越來越強調其國的一面，香港只是國家體系下的地方層級。香港人已耳熟能詳的『一國』先於『兩制』、香港要人心回歸、要提防外國勢力干預一國兩制實施、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等說法，就是從國家立場發的話，目的就如一位中央智

⁷⁶ 靈魂歌詞：〈Beyond〈光輝歲月〉背後的故事〉，《每日頭條》娛樂版，2017年4月11日。〈<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k849qk8.html>〉，檢索：2019年7月21日。

囊學者說，是『加速一國中心化過程』，把香港真正納入中國國家體系之中」。⁷⁷結果反而造成「香港認同」的逆向成長，「我城」朝向「城池化」的心理防禦模式發展，在捍衛自由的位置上不惜自我孤立，有人在擔心，年輕世代的香港學子會不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對抗「其他人的祖國」？

年輕世代指的當然不是三十九歲的廖偉棠、四十五歲的陳滅，或五十三歲的鍾國強，相信很多人都會想到雨傘運動的領袖黃之鋒（1996-），個子瘦小的十八歲少年，從他身上可以看到「最年輕」世代的一些想法。黃之鋒曾在受訪中表示：「我自己也會去參加六四集會，只是我不認同中國有民主之後香港才能有民主，這應該是兩件事情。我覺得我是中國人，我也愛國，但是香港是香港，大陸是大陸，我們跟司徒華那代人的想法不全然相同」。⁷⁸這是黃之鋒最溫柔敦厚的說法，其實他更多時間對中國大陸充滿敵意，一旦他置身運動中的人群中央，強大的鬥魂便自動燃燒，立馬進入戰鬥狀態，他說：「當我聽到國歌播放時（指《義勇軍進行曲》），我的憤怒絕對大於感動」、「它告訴你：『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但我們受的待遇和奴隸有何不同？」⁷⁹黃之鋒的思維十分敏銳，很清楚知道香港在中共政治版圖裡的地位，和命運。他更清楚這一代年輕人在追求什麼，他曾經明白告訴《紐約時報》說：「選舉改革是一場世代的戰爭（Electoral reform is a generational war）」，⁸⁰沒說出來的潛台詞，恐怕是：這場戰爭有一個強大的敵人。「祖國」不會成為敵人，「他國」才會。

撐開一把黃雨傘很簡單，要化解「我城」與「他國」所陷入的敵對態勢，卻很難。誠如鍾國強詩裡寫的——「開在雨傘上的馬路／也沒有像路一樣好走」。

⁷⁷ 李家翹：〈中國和香港：國家與城市的探戈〉，《華人文化研究》第5卷第2期（2017年12月），頁49。

⁷⁸ 陳奕廷：〈美麗新香港〉，《傘裡傘外：民主前夕的香港故事》（臺北：水牛文化，2015年），第九章，頁222-223。

⁷⁹ 林蕙娟報導：〈變種學運人！17歲佔中領袖黃之鋒：改革是世代戰爭〉，《ETtoday新聞雲》〈<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41002/408545.htm>〉，檢索：2019年12月20日。

⁸⁰ Chris Buckley and Alan Wong, "At 17, Setting Off Protests That Roil Hong Kong",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 2014. < <https://www.nytimes.com/2014/10/02/world/asia/hong-kong-china-democracy-protests-students.html> >，檢索：2019年12月20日。

五、步入雷池：城邦化的憂慮

一個自由的社會不會只有單一的聲音，有人同意不得已的暴力，有人無論如何都反對暴力；有人恐中，有人傾中；有人在香港落地生根，有人當作過渡的寓所。有時少部分抵抗者發出異議的聲音，會被傳媒和輿論放大，成為時代的焦點，同時也是城市運動裡失控的噪音。香港本土派稱作「國師」的民俗學者陳雲（1961-），在《香港城邦論》（2011）一書中提出「只要自治，不必獨立」，真正落實一國兩制的城邦論，受到很多的討論。

陳雲誤用了「城邦」概念。

城邦（city-state）是指由一個單一城市統治一小塊領土，公元前八世紀的雅典即是典型，人口規模或面積都很小。古典城邦的統治機制在「代議制」，遴選出一個在規模上足以充分且全面代表整個公民群體的機構，並允許它在特定情形或一段短時期內以人民的名義行事。雅典真正重要的統治機構是「五百人議會」和一些擁有龐大民選陪審團的法院。⁸¹換一種現代的方式來理解城邦就更清楚了——城是形，邦是神。換言之，城邦必須由一座單一的城市構成（其形），而且是完全由自己統治——而非自行治理——的小型邦國（方得其神）。香港城邦論，即是香港建國論。在法理上立不住腳。

本文論及的香港詩人雖然表現出強烈的抵抗意志，但他們固守的是「我城」，鄧小平承諾過五十年不變的「我城」，屬於中國政治版圖的一部分。後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政策異動」，港人發現承諾不再可靠，發現「我城」傾頹了，他們用一場又一場的街頭運動來力挽狂瀾，企圖找回昔日的光輝歲月（尤其是最輝煌的1970-80年代），如此而已，沒有獨立建國或建設獨立城邦的廣大民意，只有小型獨派團體。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一連串以港府（甚至中聯辦）為抵抗對象的街頭運動，很自然重新凝聚起部分港人對英殖民時代的緬懷，包括在現場揮舞英國旗幟，波動的街頭情緒美化了那段光輝歲月。⁸²

⁸¹ 本段文字整理自：喬治·薩拜因著，鄧正來譯：《政治學說史：城邦與世界社會》，第四版（上海：上海人民，2015年），頁40-46。

⁸² 英殖民的負面政績確實被部分人遺忘了，「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便在1974年發表過一本名為Hong Kong: A Case to Answer的小冊子，它指出港英政府為英國庫房帶來巨大收入，為英資大財團和上海工業家創造了一個賺錢的天堂，卻一直讓社會的低下層過著天天勞苦、怎樣努力也無法翻身的絕望人生。小冊子認為如果現實不容許英國即時撤離香港，英國

黃雨傘革命是「我城」街頭運動的一次高峰，它改變了這座城市的體質，變得敏感、尖銳、易燃，因為港人深刻體會到祖國對他們的「擁抱」，從思想教育到法治精神，漸漸融為一體，「我城」的靈魂終將消失。

每次「六四」紀念日，都會引發香港文人對「我城」前途的省思，2019年適逢「六四」三十週年，任教於理工大學的小說家張婉雯（1974-），在〈茶座旁邊的戰爭與和平〉（2019）裡回想起五年前的黃雨傘運動：「我這一代香港人，對軍隊是陌生的。城市就是穩定與秩序的象徵；活在當中的我們，只知安榮尊貴。……………我這一代香港人，沒經歷過真正的戰爭；我最感受到武力張狂的時候，應是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期間。當時我每星期有一門夜課，課室窗外是尖沙嘴警署附近的大馬路，授課中途，常有警車出動，『嗚嗚』笛鳴與刺眼紅光闖進課堂中，我和同學都沉默下來，望出窗，想像警車要往何處去，將要發生甚麼。那些日子的課堂，與現實生活是平行時空」。⁸³港府過度使用鎮暴警力導致黃雨傘革命陷入「城市戰爭」的氛圍，對久享太平盛世的香港來說是極大的衝擊，飽含暴力想像的警笛和紅光，對市民心理造成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大家都在擔心——香港會不會淪為下一個天安門？

隔兩天，淮遠（1952-）發表了一首短詩〈罰抄〉（2019），用黑色幽默的語氣來挖苦中共在所有電子傳媒或文本裡的「六四禁忌」。在學校這個思想教育的大本營，「六四」更是不准提及的字眼，否則就得乖乖受罰。淮遠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的，頂多就「罰寫」：

我以後不再提這個日期
我以後不再提這個日期……
某校某班全體
被校長罰抄五十遍
老師也不能倖免

便應該立即結束殖民地的不公義現狀。」詳見孔誥峰：〈從殖民史尋找未來——香港社會進步與全球戰略價值的殖民地根源〉，收入本土論述編委會編：《本土論述 2009》，頁 129。可是又有多少港人知道這些前朝舊事？當梁秉鈞在詩歌裡重建「舊香港」的時候，似乎忽略了這些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懷舊變得理直氣壯，英殖民是百年不壞的磚。

⁸³ 張婉雯：〈茶座旁邊的戰爭與和平〉，《虛詞》2019年6月3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35.html>〉，檢索：2019年7月28日。

要用粉筆抄五十遍
黑板寫滿了刷掉再寫。

同學們在單行紙上橫寫，序號在左
老師在黑板上直寫，序號在下
一切皆如校長所願
除了一點——
不管老師還是學生
通通自己罰自己
多抄了十四行。⁸⁴

一旦犯禁的罰則被兒戲化，五十行之外，再加十四行的自罰，是對威權的挑釁與輕蔑。相較與張婉雯對城市戰爭的恐懼，淮遠代表著另一種柔軟且強韌的處世態度，一種黑色的抵抗詩學，意思簡單，卻直中「言論自由」之要害，「我城」與「他國」最根本的差異就在「自由」二字。當然，群眾運動的語言不會經過這種藝術性的昇華，有時連修飾也省掉，且看「六四」三十周年燭光悼念集會，主辦單位推出的年度主題簡直是拔刀在手，直取人心：「今年是『六四』屠殺 30 周年，支聯會定出『人民不會忘記一平反六四！公義必勝！』為今年的悼念主題。我們沒有忘記當年學生和市民的付出和犧牲，也沒有忘記過去 30 年因堅持說出真相、悼念和爭取平反的仁人志士」。⁸⁵超過十八萬人參加維園的燭光晚會，對香港這個中國境內唯一的民主聖地來說，這人數是常態中的最大值，當晚沒有發生更重大的事件。鍾國強寫了〈六月雨〉（2019）、鄧小樺（1978-）寫了〈家務〉（2019）、熒惑（1986-）寫了〈2089——六四三十周年〉（2019），分別記下他們的感受，當然還有更多的散文、隨筆和評論，從不同角度省思這場悲劇對香港的意義。才過沒幾天，港府對《逃犯條例》的修訂引起巨大的民怨，「反送中」大遊行竟有百萬人上街，「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的規模倍增到兩百萬人，那可是全港七分之二的人口。曾是最年輕立法議員的羅冠聰（1993-）說：「繼一百萬人走上街頭，又

⁸⁴ 淮遠：〈罰抄〉，《虛詞》2019年6月5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41.html>〉，檢索：2019年7月28日。

⁸⁵ 網編：〈「六四」30周年悼念活動〉，《香港市民支援愛國運動聯合會》，〈<https://hka8964.wordpress.com/6430-2/>〉，檢索：2019年7月28日。

有二百萬人懷著更悲憤的心情遊行，似乎整個城市都無路可逃了。這是一個必須要立即處理的政治問題，否則這將會變成整個城市秩序、政府管治的不穩炸彈」。

⁸⁶無路可逃的困獸，既悲憤又絕望。⁸⁷

廖偉棠在 6 月 11 日寫下〈同仇〉（2019）：

昨夜我也是被透明盾牌
困逼成廣場的人
和你一起撞響廣場的疆界
昨夜我也是
被紅眼狼犬驅趕的人
和你一起四散如城寨

⁸⁶ 羅冠聰：〈無路可逃〉，《虛詞》2019 年 7 月 4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96.html>〉，檢索：2019 年 7 月 28 日。「羅冠聰於 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當選，以 23 歲之齡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但其後因宣誓風波喪失議員資格。」詳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羅冠聰>〉，檢索：2019 年 7 月 28 日。

⁸⁷ 香港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195?-）針對《逃犯條例》的修訂提出一番很有說服力的見解：「一百七十多年以來，香港這城市最首要的價值，在於它是一塊自由之地，容納不同地方的移居者來港。也因為這裡的自由精神和法治體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框架，讓流亡與異見者在面對強權打壓之時，提供法律上起碼的庇護和讓他們有機會尋求各種支援。最近《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爆的爭議和反抗，促成了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原因固然是修例的內容影響廣泛，甚至會動搖香港自治地位的基礎，令人人自危，但也在於，它觸碰到香港和香港人歷史體驗的最深處。香港，憑藉著這裡積累了百多年的法治架構，以及尊重程序正義的文化，使她在不少歷史的關鍵時刻，成為流亡者的庇護站，雖然有時這種庇護只是很短暫和脆弱。然而就香港文化的深層而言，這城市仍舊是一塊『化外之地』，為過去與未來的流亡者，預備他們夢中的自由之鄉。『逃犯』——也許就是這個城市的靈魂最恆久的自我形象。」詳見安徒（本名羅永生）：〈香港：歷史裡的「逃犯天堂」？〉，《虛詞》2019 年 7 月 25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935.html>〉，檢索：2019 年 7 月 28 日。這種情結在其他華人城市中極為罕見，香港不像是個擁有偉大思想情操的城市，它更多像個功利至上的國際大城市。羅永生這番說法，乃建立在百年來香港移民社會的形成，尤其自「我城」意識萌芽之後，這座孤立無援的城市面對回歸問題，以及後來的一國兩制所衍生的生存危機，數百萬港人的危城心理，非常具體地投射在三十年不曾間斷或冷卻的「六四」紀念活動上。在此顯現出來的城市性格，是不容質疑的。精明的港人比誰都清楚——失去庇護別人的能力，將來勢必無法庇護自己。

別問我香港的下落
別問我詩的下落
那可以回答的人如今在監獄裡
那可以寫的人如今在寫檄文
漸漸他的非常
成為我們的日常⁸⁸

廖偉棠的政治詩是很街頭的，畫面感強烈，情緒很到位。鎮暴部隊的透明盾牌是城市抵抗運動的敵對標誌，惡的象徵，「我」和「你」被壓縮、碰撞成廣場的一份子，這城市失去了對話的機制。只有走在運動最前線的人知道香港何去何從，但他們被關了起來，他們在準備下一次革命至死不渝。香港原是一座希望之城，東方之明珠，革命和烈士都不是土產的事物，但形勢發展下來，「漸漸他的非常／成為我們的日常」，香港必將陷入一場無人可以倖免的城市戰爭。廖偉棠的想法十分灰暗。隔天，年輕詩人茱瑟寫了〈六月十二日〉，描述自「黃雨傘」以降，近五年來香港街頭抗爭的感受：「我們的身影彼此交錯在這五年之間／同一條橋、同一條馬路／鐵馬、磚頭、傘／我們回來了：換上一片雨景／以及重新鬆過的馬路／但一樣人海是我城的圖騰」。⁸⁹

在回歸之前，任誰都不能想像一片人海會成為「我城」的圖騰，華人世界前所未見的兩百萬人的大集會，足以動搖一個政權的大集會，就發生在6月16日，那一天在有心人眼裡即是「自由世界的最前線」。⁹⁰特首沒有被兩百萬人的浪潮淹沒，到了7月份，更多遊行接踵而至，發生多次暴力鎮壓和衝突。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年輕講師譚蕙芸，在7月15日寫下〈一念天堂一念地獄〉（2019），曾任新聞記者的她用敏銳的眼光側錄了一個現場：

⁸⁸ 廖偉棠：〈同仇〉，《虛詞》2019年6月25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57.html>〉，檢索：2019年7月28日。

⁸⁹ 茱瑟：〈六月十二日〉，《虛詞》2019年6月25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57.html>〉，檢索：2019年7月28日。

⁹⁰ 這句子是一個章節的名稱，來自22 Hongkongers：《自由六月：2019年香港「反送中」與自由運動的開端》（臺北：新銳文創，2019年）。

大學年代在沙田區住過四年，我對新城市廣場懷有感情。昨晚從白天遊行、傍晚十字路口攻防，到晚上趕到新城市廣場。從狹窄的通道進入中庭，我目定口呆，第一個感覺是：「這是新城市『戰場』」。……整個畫面好超現實，全副裝備防暴警在中庭列陣進攻，來購物的顧客被困商店，店鋪紛紛落閘，員工和客人滯留店內，在 Zara 的大玻璃後，買衫客人八卦地隔着玻璃觀看，拿手機拍下這套混戰劇目，他們的表情有驚惶也有好奇。⁹¹

從她熟悉的廣場到超現實的戰場，除了眾多詩人和學者寫下自己參與活動的悲憤心境，除了透過街頭運動對香港前途的灰暗思考，當然少不了看熱鬧的八卦市民，譚蕙芸對他們的描述是中性的，在大動盪的時局中，有些人沒有參與行動但不表示他們沒有看法，他們可能是革命者和被革命者之外的反革命者，或無感的獨行者，不過其微弱的聲音被兩百萬人的分貝掩埋掉。不管對哪個陣營都一樣，香港不再是以前那個單純的國際經貿大都市，或亞太金融中心，強大的城籍意識將香港從中國政治版圖上切斷出來，成為真正的特區。由於中共和港府的政策變異，引發了諸多民怨，訴諸街頭抗爭的結果，「我城」自然陷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戰火。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道盡香港前景的無奈。

這條名為《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又叫「送中條例」的法案一旦修訂完成，不但嚴重侵蝕了保障自治的《基本法》，將來所有以政治和宗教名義定罪的犯人，都會被送到中國審判，香港法治從此門戶洞開。一場形同生死存亡之戰的街頭抗爭，是絕對免不了的。年輕詩人逆彌在 7 月下旬發表了〈無題〉（2019），用反諷的手法刻劃了陷入僵局的反送中情況：

只不過是陽光普照的週末
馬路有些擠塞
只不過是適合旅遊的假期
治安有些嚴密
只不過是交通繁忙的時段
班次有些調動

⁹¹ 譚蕙芸：〈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虛詞》 2019 年 7 月 15 日，〈<https://p-articles.com/critics/913.html>〉，檢索：2019 年 7 月 28 日。

只不過是回家做飯的下午
窗外有些聲音
〔略〕
只不過是忙於考試的學生
課外有些活動
只不過是表達訴求的民眾
情緒有些激動⁹²

語氣聽起來，好像這些動亂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必太在意它的發生或它的後果，反正就那麼回事，頂多就如此。誰會這樣想呢？誰放任這一切的發生？這才是逆彌要說的。不過，這首詩最重要的是將近尾聲的兩句：「只不過是某年某月的某天／殺了一些人民」，⁹³7 月的情況尚未惡化，未有一人被殺，逆彌的誇飾修辭背後隱藏著一股過於盲目和巨大的敵意，很可能來自同代人圈子裡的言論氛圍，他們對港府完全絕望，把所有的官方言行和政策，皆視同對人民的殺戮，輕描淡寫的，殺了一些人民。這種思想為「反送中」後續的發展埋下地雷。

8 月是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的旺季，水炮、警棍、長棒，還有被縱火的地鐵和被癱瘓的機場。9 月有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城市游擊，有藍色的水炮幫城市上漆。10 月適逢中共建政 70 週年，香港狼煙四起，大量商場、店舖、地鐵站關閉，一名十八歲示威者曾志健被近距離的實彈擊中左胸口倒地。詩人也拔出了凌厲的詩筆，呂永佳的〈3 CM〉和淮遠的〈致被槍傷的中五生〉即時趕來聲援，茱瑟用一首〈找〉（2019）控訴警方過度執法：

不用找了
子彈不在這裡，埋在我的胸口
不用找了
催淚氣體不在這裡，早就滲滿街頭
真的不用再找了

⁹² 逆彌：〈無題〉，《虛詞》2019 年 7 月 23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930.html>〉，檢索：2019 年 12 月 28 日。

⁹³ 同前註。

詛咒不在我的喉嚨裡，在你們蘸了鹽的手
在我的鮮血凝固時，你們的名字與成就
從人類的歷史裡再也找不到
找到的，是我曾在時間裡刻鑿的兩個詞語
民主，與自由⁹⁴

這一槍意味著局勢的嚴重失控，全港陷入激烈的警民衝突，熒惑的悲憤像催淚氣體主導了寫作觀點，他跳出個案的是非評議，直接跳到未來歷史對整個反送中警方行使暴力的終極評價，他深信民主和自由會是永恆的存在。關於「黑警」，在鎮壓行動當中暴紅的「光頭警長」香港警務處機動部隊警署警長劉澤基，在其臉面上披露了許多警員遭到勇武派份子以利器割傷、汽油彈燒傷、高濃度強酸灼傷的畫面，那是各大傳媒不願報導的「另一方真相」。這一槍背後有更多故事無法呈現在詩裡，雙方都是受害者，但詩人只站在「我方」，陳述「我方的真相」。

林鄭月娥在 10 月 4 日宣布引用《緊急法》來制訂《禁止蒙面規例》，此一舉動當然是火上加油，導致局勢全面失控，勇武派守護最後的理大校園，有些人甚至留下遺書，以面對警方的圍城之戰。逆彌寫了〈致理大留守者〉（2019）支援他們：

你或許也不清楚 有沒有人在水渠中溺死
有沒有人被警察射死 有多少人被運上大陸
這些事就像從六月以來的所有死亡 飛霜永遠彌留殘存
我們處身同一個城市 你那邊卻成了荒島
我不會明白你現在的悲傷與孤獨
在外面能做的或許都做了 我其實也同樣茫然
〔略〕
我現在寫下這首詩 而你正在生死之間無路可去
我 和倖存的眾人
殺不死三萬警隊

⁹⁴ 熒惑：〈找〉，《虛詞》2019年10月2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1056.html>〉，檢索：2019年12月28日。

我們仍可以投票 到處懲罰黃店 大叫香港人報仇
我們做甚麼也可以
我們甚麼都做不到⁹⁵

在網路發達的時代，造謠和闢謠已成日常瑣事，這首詩利用了街頭運動中的訊息混亂，口耳相傳的死亡消息被網媒高度渲染，真偽莫辨，所以沒有人知道死了多少人，就像「六月」，天安門事件以來永遠被隱匿的死亡。這裡頭有巨大的懷疑、巨大的恐懼、巨大的絕望，和殺氣。把詩寫到這個地步，所有詩歌審美的要素都在戰火中化作灰燼，逆彌徹底成為香港詩壇的勇武派，他感到遺憾，因為他（們）殺不死三萬警隊。這個念頭很可怕。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建立在法治上面，民主抵抗運動不能過度仰賴暴力，否則就是真正的戰爭。11月28日，理大事件正式落幕，幸好有更多理性的思考在平衡趨於惡化的局勢，這場半世紀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社會動盪，才沒有被暴走的「攪炒」（玉石俱焚）思維導進絕路。此刻逆彌應該好好思考鍾國強在前文說的那番話：「那種透紙而來的怒氣，……在揭陳時弊、怒而抗爭之餘，於詩是否有所斲害呢？」

結語

中共官媒《新京報》在香港回顧十年的一篇報導上說：「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浮城找到生根的土地。十年來，香港人對中國的身份認同與日俱增」，⁹⁶西西在《浮城誌異》裡描述每逢夏天（5-9月份）是浮城的起風季節，城裡的人都做相同的夢，他們腳不著地的浮在半空中，這也成了香港人在家國想像方面的一種失根象徵。「我城」，其實也是一座「浮城」。

回歸後的浮城，並沒有像《新京報》說的那樣落地生根，它始終飄浮在原來的地方，一方面緬懷著過去「舊香港」的「光輝歲月」，一方面企望未來能夠「港人治港」和「真普選」。所以才有了這一連串的「我城之戰」。

中共不能接受這樣的想法，他們也不能理解「這個暑假，對很多香港年輕人

⁹⁵ 逆彌：〈致理大留守者〉，《虛詞》2019年11月26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1143.html>〉，檢索：2019年12月28日。

⁹⁶ 楊繼斌、徐春柳：〈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增進港人情感歸屬〉，《新京報》，2007年6月11日。

來說，就像是一場線上遊戲的實體化。《香城 Online》，香港年輕抗爭者這樣戲稱從 6 月迄今的街頭運動。有人是火系魔法師、水系魔法師、蟲系魔法師……，各種『系』代表不同意義，只有參與街頭抗爭的『玩家』才懂。他們還發明了線上文字，就像是《魔戒》中的精靈語，只有他們才看得懂，用來溝通各種行動。⁹⁷網路世代的年輕人，消解了現實的城市巷戰跟虛擬世界之間的隔閡，用網遊的世界觀重構了他們的「香城」，在這座跟現實空間完全疊合乃至虛實莫辨的網遊空間裡，培訓新玩家，以下這段文字展現了世代性思維：

這款號稱「最大真人 RPG」的「遊戲」壓根沒有本體，連登上的只是一個「攻略本」，它也根本就不是什麼「遊戲」，而是個貨真價實的暴徒培訓手冊，是一些居心險惡的人用來掩人耳目的幌子。《香城 Online》，顧名思義，就是一款以影射香港的虛構城市「香城」為地圖的「網遊」，玩法是「跟隨隊伍在不反對時間內遊行，再自由活動去爬山，沿途有不同怪獸需要打，守衛我城」，其實就是手把手教暴徒如何喬扮偽裝、暴力襲警、打砸搶燒、然後逃之夭夭。儘管是虛構遊戲，《香城 Online》的攻略可一點都不含糊，地圖（交通路線）、職業（暴徒分工）、怪物（警察）、裝備（防具、工具及藥品）等介紹一應俱全，而且「可操作性」極強，「包教包會」，能在最短時間內「批量生產」黑衣人。⁹⁸

上述文字很清楚的指出這款遊戲的現實目的，它根本就是一部《貨真價實的暴徒培訓手冊》，很契合網遊世代的年輕革命族群，在這裡不談思想，不討論議題，只強調裝備和行動，為一場城市巷戰的新人作好準備。虛擬世界的現實感，或者現實世界的虛擬感，會讓勇武派更義無反顧的投入他們需要的戰爭。西西當年在描寫「我城」和「浮城」之際，萬萬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年輕人用自製的武力裝備來「守衛我城」。西西寫的是寓言，也是預言。只不過「未來的」現實比她當年的預言更殘酷，大量香港青年的懸浮狀態，不是因為無根，他們有無比強烈的本

⁹⁷ 管嫫媛：〈專訪勇武派青年：持續上街死鬥值得？「就是要加速滅亡，讓中共不能利用香港賺錢！」〉，《商業周刊》1677 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3000720>〉，檢索：2019 年 12 月 28 日。

⁹⁸ 清遠：〈香城 Online：貨真價實的暴徒培訓手冊〉，《遊戲》2019 年 11 月 01 日，〈<https://kknews.cc/zh-tw/game/ljr2qb9.html>〉，檢索：2019 年 12 月 28 日。

土意識，可他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每一吋土地上蓋的房屋都得付出全球最高的單價，陸資是炒房的元凶，炒到大部分人被沉重的租金榨乾薪資，小部分人剩下劏房可以選擇。然而，每天都有大量內地人士南下香港謀生，劏掉港人的工作機會和生活空間，普通話和粵語在生活裡磨擦，兩種語言暗中分裂了香港。自 1970 年代由粵語建構起來的文化自覺，逐年被普通話蠶食著在地性的優勢，當城市抵抗運動興起，粵語和它的族群便重新凝聚，為「守衛我城」不惜一戰。身陷催淚彈裡的勇武派看不到未來，「他們想要打倒眼前的香港警察、香港政府外，背後還有更大的魔王：『北京政府』」。所以他們不斷地加入每週末、甚至週間的快閃活動，除了逼使香港政府撤回『送中條例』外，更要向北京政府表達強烈不滿，試圖爭取更多民主自由。⁹⁹《香城 Online》成了他們經營人生的雲端版秘密基地，行動和武力滋養著思想，他們成為中共永遠解放不了的抵抗份子。

高齡逾八十的西西，她在最近一次（2019/12/30）訪問中表示：「《浮城誌異》寫於 97 前，當時的心情其實很複雜，你說有焦慮心態，其實也有所寄望、期許，對於未來，並沒有答案，就看我們做出怎樣的世界。以這半年的情況來看，是『危城』，我看新聞，血壓就升高，看到許多年輕人頭破血流，真是觸目驚心」。¹⁰⁰眼睜睜看著香港從「我城」→「浮城」→「危城」，西西做不了什麼，她的詩和小說也救不回香港。其他香港詩人用即時的文字記下眼前發生的一切，用火焰一般的文字來「撐香港」，除此之外，也做不了什麼。大家心裡都很清楚，這是一場「守衛我城」的未竟之戰。

⁹⁹ 島民你覺得呢：〈示威衝突升級！港人列上街頭必備「香城 Online 裝備」：最大真人 RPG 上線了〉，《ETtoday 新聞雲》2019 年 08 月 12 日，〈<https://www.ettoday.net/dailemon/post/45493>〉，檢索：2019 年 12 月 28 日。

¹⁰⁰ 黃愛琴：〈香港「浮城」變「危城」，西西：我們欠年輕人一個理想社會〉，《信報財經新聞》，2019 年 12 月 30 日，〈<https://monthly.hkej.com/monthly/article/id/2340369/香港「浮城」變「危城」+++西西：我們欠年輕人一個理想社會>〉，檢索：2019 年 12 月 31 日。

徵引書目

- 〈怯於一九九七問題，有人自香港撤資——工商界亟盼中國宣布決定〉，《Hong Kong Industrial News》1982年8月。
- 《香港的發展（1967-2007）——統計圖表集》，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07年。
- 22 Hongkongers：《自由六月：2019年香港「反送中」與自由運動的開端》，臺北：新銳文創，2019年。
- 本土論述編委會、新力量網路合編：《本土論述 2009》，臺北：漫遊者，2009年。
- _____：《本土論述 2013-2014》，臺北：漫遊者，2015年。
- 石火編輯部：《引世界惶恐之流行病》，新竹：凌網科技，2006年。
- 西西：〈長著鬍子的門神〉，《大拇指周報》第15期，第9版，1976年1月31日。
- _____：〈天色微明〉，《星島日報》星期日雜誌，1989年6月11日。
- _____：《西西詩集》，臺北：洪範，2000年。
- _____：〈快餐店〉，《大拇指周報》第12期，第6-7版，1976年1月8日；修訂版，《西西詩集》，臺北：洪範，2000年。
- _____：〈寫作在香港這樣的地方——2019年紐曼華語文學獎獲獎謝辭〉，《聯合報》副刊，2019年3月23日。
- 何福仁：《如果落向牛頓腦袋的不是蘋果》，香港：素葉，1995年。
- 呂大樂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2011年。
- 李家翹：〈中國和香港：國家與城市的探戈〉，《華人文化研究》第5卷第2期（2017年12月），頁43-50。
- 李婉薇：《清末的粵語書寫》，修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
- 秀實：〈回歸時節話文壇〉，《新晚報·晚風》第235期，1997年7月20日，頁11。
- 侍建國：〈港式粵語及其身份認同功能〉，《語言戰略研究》2018年第3期，頁42-28。
- 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1995年。
-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第二版，香港：圓桌文化，2015年。

- 秦晞輝：〈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香港 01 周報》第 64 期，B19 版，2017 年 6 月 12 日。
- 高玉娟：〈社會運動為甚麼要唱 Beyond 的歌？—— Beyond 所體現的搖滾原真性及社群力量〉，《文化研究的嶺南》第 21 期（2010 年 11 月），頁 1-32。
- 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5 年。
- 梁秉鈞：〈中午在鰂魚涌〉，《中學生周報》第 1127 期，第 7 版，1974 年 7 月 5 日。
- _____：〈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第 53 期（1989 年 5 月），頁 18。
- _____：《游離的詩》，香港：牛津大學，1995 年。
- _____：《梁秉鈞 50 年詩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年。
- 陳滅：《單聲道》，香港：東岸，2002 年。
- _____：《市場，去死吧》，增訂再版，香港：石磬文化、香港文學館，2017 年。
- 陳大為、鍾怡雯編：《華文文學百年選·香港卷》，臺北：九歌，2014 年。
- 陳大為：《鬼沒之硯：當代漢語都市詩研究》，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2016 年。
- 陳奕廷：《傘裡傘外：民主前夕的香港故事》，臺北：水牛文化，2015 年。
-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九龍：花千樹，2009 年。
- _____：《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新詩卷》，香港：商務，2014 年。
- _____：《根著我城》，臺北：聯經，2019 年。
- 陳潔儀：《香港小說與個人記憶》，香港：天地，2010 年。
- 勞思光：〈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問題〉，《七十年代》總第 140 期（1981 年 9 月），頁 20-24。
- 喬治·薩拜因著，鄧正來譯：《政治學說史：城邦與世界社會》，第四版，上海：上海人民，2015 年。
- 黃楊烈：〈香港——一九九七年？〉，《明報月刊》第 15 卷第 2 期（總 170 期）（1980 年 2 月），頁 69-78。
- 黃萬華：《百年香港文學史》，廣州：花城，2017 年。
- 黃錦明：〈一九九七你能走得了嗎？——香港人移民外國前景分析〉，《百姓》創刊號（1981 年 6 月），頁 11-13。
- 楊繼斌、徐春柳：〈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增進港人情感歸屬〉，《新京報》，2007

年6月11日。

廖偉棠：《浮城述夢人·香港作家訪談錄》，香港：三聯，2012年。

_____：《傘托邦》，香港：水煮魚文化，2015年。

甄美玲：〈九七前途·人心動盪；首相訪華·形勢急轉〉，《七十年代》總第156期（1983年1月），頁8-9。

劉紹銘編：《舊時香港》，香港：牛津大學，2002年。

劉蜀永編：《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2004年。

鄭政恆：《記憶前書》，香港：三聯，2007年。

黎漢傑編：《2014香港詩選》，香港：練習文化實驗室，2016年。

鍾國強：《浮想漫讀》，香港：文化工房，2015年。

_____：《開在馬路上的雨傘》，香港：文化工房，2015年。

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8.

Richard Hugh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90.

Simon During,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https://medium.com/recall-hk/f-5e197bfb81e7>〉。

Regina：〈凝視香港 | 照看《我城》：西西筆下的香港〉，《BIOS monthly》，2013年7月5日，〈http://www.biosmonthly.com/issue_topic/3377〉。

安徒（羅永生）：〈香港：歷史裡的「逃犯天堂」？〉，《虛詞》，2019年7月25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935.html>〉。

吳文基：〈「今天我」——哪個今天？哪個我？〈海闊天空〉的多重挪用〉，《藝若是 Those As Art》，2017年12月22日，〈<https://medium.com/those-as-art/今天我-哪個今天-哪個我-海闊天空-的多重挪用-a771633f8384>〉。

林蕙娟報導：〈變種學運人！17歲佔中領袖黃之鋒：改革是世代戰爭〉，《ETtoday新聞雲》，2014年10月2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41002/408545.htm>〉。

島民你覺得呢：〈示威衝突升級！港人列上街頭必備「香城 Online 裝備」：最大

- 真人 RPG 上線了〉，《ETtoday 新聞雲》2019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ettoday.net/dalemon/post/45493>〉
- 逆彌：〈致理大留守者〉，《虛詞》，2019 年 11 月 26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1143.html>〉。
- ___：〈無題〉，《虛詞》，2019 年 7 月 23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930.html>〉。
- 張婉雯：〈茶座旁邊的戰爭與和平〉，《虛詞》，2019 年 6 月 3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35.html>〉。
- 淮遠：〈罰抄〉，《虛詞》，2019 年 6 月 5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41.html>〉。
- 清遠：〈香城 Online：貨真價實的暴徒培訓手冊〉，《遊戲》，2019 年 11 月 1 日，〈<https://kknews.cc/zh-tw/game/ljr2qb9.html>〉。
- 黃愛琴：〈香港「浮城」變「危城」，西西：我們欠年輕人一個理想社會〉，《信報財經新聞》，2019 年 12 月 30 日，〈<https://monthly.hkej.com/monthly/article/id/2340369/香港「浮城」變「危城」+++西西：我們欠年輕人一個理想社會>〉。
- 廖偉棠：〈同仇〉，《虛詞》，2019 年 6 月 25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57.html>〉。
- 熒惑：〈六月十二日〉，《虛詞》，2019 年 6 月 25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57.html>〉。
- ___：〈找〉，《虛詞》，2019 年 10 月 2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1056.html>〉。
- 管嫻媛：〈專訪勇武派青年：持續上街死鬥值得？「就是要加速滅亡，讓中共不能利用香港賺錢！」〉，《商業周刊》1677 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3000720>〉。
- 網編：〈「六四」30 周年悼念活動〉，《香港市民支援愛國運動聯合會》，〈<https://hka8964.wordpress.com/6430-2/>〉。
- 羅冠聰：〈無路可逃〉，《虛詞》，2019 年 7 月 4 日，〈<https://p-articles.com/works/896.html>〉。
- 譚蕙芸：〈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虛詞》，2019 年 7 月 15 日，〈<https://p-articles.com/critics/913.html>〉。
- 靈魂歌詞：〈Beyond 〈光輝歲月〉背後的故事〉，《每日頭條》娛樂版，2017 年

4月11日。<<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k849qk8.html>>。

Chris Buckley and Alan Wong, “At 17, Setting Off Protests That Roil Hong Kong”,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10/02/
world/asia/hong-kong-china-democracy-protests-student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4/10/02/world/asia/hong-kong-china-democracy-protests-students.html)>。

Editor, “Xi Xi wins 2019 Newman Prize”, MCLC Resource Center. <
<https://u.osu.edu/mclc/2018/10/10/xi-xi-wins-2019-newman-prize/>>。

The Battle for “My City”: Hong Kong’s Story, in (and out) of texts (1974-2019)

Chan, Tah-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Native City" consciousness created by Xixi in her work *My City*.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rocess by which Hong Kong poets' literary works have transformed over forty years, moving from simple narratives regarding city life, to an expression of nostalgia for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to a sense of conster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1997 handover, to finally an intense urban resistance movement. This paper will employ novels, essays, cultural belles lettres, social movement reportage, etc. to develop a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track this “textual city” and the changes its spiritual sensibility has undergone. This essay will posit that 2003 was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in which a "resistive identification" that was latent with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was brought out by a series of social events, gradually rising to the surface. This sentiment on the one hand emphasizes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my cit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strengthening a sense of hostility towards "the motherland of other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my city” vs. “the other country” has led Hong Kong poetry to become ever more closely linked with political poetry. Hong Kong poetry is now mired in an urban politics of warfare, with no way of extricating itself.

Keywords: Hong Kong, My City, city, politics, street movemen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